

理论与实际

LILUN YU SHIJIAN



9
1959

目录

- 跃进的计划 战斗的号角.....本刊编辑部(1)
-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意义不容抹煞.....继迅(3)
- 人民公社好得很.....陈国璋(9)
- 辉煌成就的一年.....中共番禺县南村人民公社委员会第一书记 何木连(13)
-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吴修(17)
- 从新会县环城人民公社建立前后的一些材料驳斥对
人民公社的污蔑
- 论“鼓气”.....陈盈(24)
- 谈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王致远(27)
- 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郑淳(31)
- 对王季思先生“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一文的意见
.....中山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裘汉康(35)
-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若文(40)
-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比例问题.....曾野夫(44)
- 按劳分配原则有没有“两面性”?.....董崎(49)
- 与杨樾同志商榷
- 也谈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廖庆薪(52)
- 对杨樾同志“关于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问题”一文的意见
- “好得很”和“糟得很”.....杨奎章(55)
- 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田牧(57)
- 乐观·信心·毅力.....丘谷间(59)
- 能动性与实事求是.....何白(60)

动态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热烈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
中山大学历史系科学研究干劲十足
“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第四期即将出版
广东逻辑学学会筹备小组成立
广东省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教师学习班结束

跃进的計劃 战斗的号角

本刊編輯部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會議。會議分析了当前的經濟形勢，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經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不可辯駁的事实，証明了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完全正确；証明了我国人民公社这个新生的社会組織的巨大优越性和无穷生命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誹謗和破坏，坚决駁斥了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和批判了右傾情緒，向全党全民提出了厉行增产节約的群众运动，爭取在今年內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的伟大的战斗任务。我省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我国人民的这一重大胜利而欢呼！并坚决响应党的战斗的号召！

經過調整后的今年国民經济发展計劃，仍然是一个繼續跃进的計劃。今年鋼的产量为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五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为四千六百二十万担。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經济大跃进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而調整后的今年計劃，鋼的产量仍然比去年增长50%，煤仍然比去年增长24%，粮食、棉花也各增长10%。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的每年平均递增速度，而且是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的速度。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會常务委員会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指出：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經济建設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建設經驗来看，工业每年增产20%以上就是跃进，增产25%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3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10%以上就是跃进，增产15%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2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由此可见，經過調整后的今年工农业生产指标仍然是繼續跃进的指标。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由于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国民經济的发展必然是高速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我国今年繼續跃进的国民經济計劃完成以后，将使我国国民經济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使我国許多工农业主要产品——鋼、煤、原木、冶金設備、发电設備、金属切削机床、棉紗、机制紙、原盐、粮食、棉花等提前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这就是說，我們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今年跃进的計劃实现以后，其重大的意义还在于：我們可以在今后三年中把原定的第二个五年

計劃指标大大提高，并且可以騰出手来，用較多的力量来加强国民經济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从而使“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爭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并且使原定在一九六七年实现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綱要可以爭取大大提前超額完成。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計劃，一个多么壮丽的前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号召啊！

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进军号角吹响了，进一步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繼續跃进的計劃提出了，现在摆在我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克服右傾思想，鼓足更大的干劲，来迎接新的战斗。

要鼓足干劲，就必须充分估計到今年繼續跃进的有利条件。我們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和不断高涨的劳动热情，有苏联以及各兄弟国家的援助和互助合作，这些都是繼續跃进的最根本的保证。此外，我們还有比去年更为有利的条件：經过去年一年的跃进，我們的物质条件比过去任何一年更加雄厚了；我們的技術队伍大大扩大了；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更丰富了；我国上半年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增長；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經过几个月的整頓后，不仅站稳了脚根，而且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我們在前进中由于經驗不足而产生的一些缺点，所遇到的一些暂时性、局部性的困难，已經迅速克服或者正在迅速地克服着。在当前国际形势方面，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被压迫的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帝国主义的内部困难和它們之間的日益增長的矛盾，等等，也大大有利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因此，我們將满怀信心地为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跃进指标而奋斗。

既然今年国民經济計劃仍然是一个繼續跃进的計劃，那么就决不能认为可以不必花什么气力就能实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为了完成今年的跃进計劃，下半年經济战綫上的各項任务是很繁重的。不管客观条件多么有利，要繼續跃进就必须鼓足干劲。我們強調尊重客观规律，并不是貶低人的主观能动性；強調科学分析也并不限制人的冲天干劲。應該說，冲天的干劲在任何时候都是发展革命事业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有右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却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績估計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經驗不足而产生的并且已經迅速被克服的若干缺点則估計过于严重；他們对于在党领导下的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却指手划脚，甚至污蔑为“小資产階級狂热性运动”，并且怀疑党的总路綫的正确性。因此，为实现今年繼續跃进的計劃，就必须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实现今年的国民經济計劃，为提前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而奋勇前进！我省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坚决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同全国人民一起鼓足干劲去夺取新的輝煌的战果。我們應該認真学好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提高認識，武装思想，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坚持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坚决批判和駁斥各种各样的右傾机会主义論調，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丰富經驗加以科学的总结，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各样新的問題加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釋和闡明，为进一步貫徹执行哲学社会科学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方針和“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而繼續努力！



論 著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意义不容抹煞

繼 迅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成就和深远影响，震撼着国内外反动派。他們搜尽枯肠，絞尽脑汁，竭力貶低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就，恶毒地詆毀和誹謗我国大跃进运动。帝国主义者把我国大跃进譏笑为“主要是紙面上的东西”。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附和着敌人的誹謗，把大跃进污蔑为“小資产階級狂热性运动”，說什么“糟得很”。讓我們就去年是不是大跃进、为什么在去年出现了大跃进、大跃进給我們带来了什么等几个問題，来反击反动派的誹謗污蔑，来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辯明大是大非。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广闊的土地上出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大跃进，今年上半年也同样出现了国民經济繼續跃进的局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毫无疑问，一九五九年将是繼續跃进的一年。

去年大跃进和今年繼續跃进的主要标志，是我国国民經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这首先表现于这两年工业和农业的总产值以及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了成就巨大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

先从工业和农业的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来看。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为一千一百七十

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百零四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六，这个增长速度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二的速度的三倍多。去年农业总产值为六百七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七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这个增长速度接近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五的速度的六倍。根据調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經济計划，工业总产值将达到一千四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将达到七百三十八亿元，增长百分之十，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工业和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速度。

再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的速度来看。一九五八年鋼、煤、粮、棉产量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洋鋼”的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跃进到八百万吨，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洋鋼”的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七的速度的一倍半以上。此外还生产了适合于农村需要的“土鋼”三百零八万吨。原煤的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一亿三千万吨跃进到二亿七千万吨，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八，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原煤的产量平均每年递增速度百分之一四点五的七倍半。粮食从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亿斤跃进到五千亿斤，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大大的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粮

食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三点七的速度。棉花从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万担跃进到四千二百万担，增长百分之二十八，也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四点七的速度。根据调整后的计划指标，今年“洋钢”的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五十，原煤产量将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粮食、棉花的产量将分别达到五千五百亿斤和四千六百万担，都将增长百分之十。“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跃进，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就是跃进，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①如上所述，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五；钢、煤、粮、棉等最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四九点五、百分之一百零八、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二十八。这样的速度难道不是大跃进吗？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增长速度的先例吗？而根据经过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百分之二五点六和百分之十；最重要的工业品“洋钢”和原煤的产量将分别增长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二十四，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和棉花都将增长百分之十。这难道不是继续保持着跃进的速度吗？

我们国民经济这种高速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先拿工业的总产值来说，我国去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今年增长百分之二五点六。而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間，美国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点八，英国是百分之三点九，西德是百分之八。又从钢产量的增长速度来看，去年一年我国的钢产量就由五百三十五万吨跃进

到八百万吨，今年又将从八百万吨跃进到一千二百万吨。而美国的钢产量从五百多万吨增长到七百二十七万吨，用了五年时间，从五百多万吨增长到一千零八十多万吨，用了八年时间。英国的钢产量从五百一十一万吨增长到七百九十七万吨，用了十一年的时间，从七百九十七万吨增长到一千一百九十七万吨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再从粮食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今年将增长百分之十。这也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未曾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拿美国这个在资本主义世界粮食产量最多的国家来说，他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九年間，粮食总产量才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平均每年只递增百分之二点三四，远远落在我国的后面，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国内外反动派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仇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他们故意装成睁眼的瞎子，胡说八道。然而，一切谎言都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一切谎言拿到现实生活中去就会破灭！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从反面证实了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他们的攻击，只能激起六亿多的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二

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的继续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和毛主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表现了我国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人民的决心和力量，它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去年的大跃进，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

①周恩来总理1959年2月26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上的报告。

的基础上出現的。在黨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我們在1956年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社會生產關係這一深刻的根本的變革，一方面解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小生產者所有制對發展生產的束縛，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开辟了廣闊的道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又為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开辟了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要求高速度發展生產，以便最充分的滿足人們物質和文化需要。同時由於我國原來經濟落后，外部還有帝國主義的威脅，只有高速度發展生產，才能儘快地鞏固我們的國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切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必然是高速度的。

隨着經濟戰綫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全國人民在1957年又遵照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進行了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這是我國在思想戰綫和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於這一革命鬥爭的勝利，進一步加強了黨的領導，並使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日益鞏固，更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由於這一革命鬥爭的勝利，在廣大的人民羣眾中形成了思想大解放，幹部和羣眾的政治覺悟提高了，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熱情更加高漲；全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也進一步加強。同時，經過整風運動，廣大的幹部、管理人員和知識分子，紛紛下鄉、上山、下廠或到基層單位去，同工農羣眾一起參加體力勞動，勞動羣眾也參加一部分管理工作，這就使國內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互相學習、互相促進的關係，更加完善、發展。所有這些都激發了人民羣眾沖天的革命幹勁，

促進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大躍進的出現。這正如劉少奇同志所說：“事情是這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社會主義革命，要求人們精神的解放，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人們精神的解放，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躍進；這種生產力的躍進，又繼續刺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改進和人們思想的前進。”^①

去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特大躍進和今年的繼續躍進，既是經濟戰綫上，思想戰綫上和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發展的結果，又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方面的任務勝利完成所準備好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生產建設任務在一九五七年的提前和超額完成，不僅大大的加強了原有的工業部門，而且建立了過去沒有過的許多工業部門和一批大規模的現代化的骨幹企業，如冶金設備製造業，采礦設備製造業，發電設備製造業，飛機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新式車床製造業，以及高級合金鋼和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等。從而提高了生產資料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大大的增加了工業產量和品種，提高了工業材料和設備的自給率（一九五七年鋼材的自給率已達到百分之八十六，機械設備的自給率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時，技術力量也有很大的增長，培養了一批能夠掌握新技術的人材，使我們能夠自己設計和建設比較大型的和技術比較複雜的工業企業。這一切說明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就為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今年的繼續躍進，奠定了良好的物質技術基礎。

所有這些，又是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方針、總路線指導下取得的。大家知道，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人民祖祖

^①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

輩輩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强烈愿望。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六亿多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迅速实现自己的愿望。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珍重亿万群众这种革命的决心和革命首创精神，大胆地同群众一起，并站在群众的前面，做革命群众的向导。早在一九五六年初，正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形成，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出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已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接着，毛主席又在“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为多、快、好、省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一九五六年出现了整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形势，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许多指标。

党在一九五八年春，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一条充分地估计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六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的总路线，它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和鼓舞下，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口号推动下，六亿多人民破除迷信，意气风发，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从而出现了我国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刘少奇同志说：“党中央这些正确的指导，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跃进。”①

由此可见，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的继续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它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的必然产物，决不是某些人主观主义地“轰”出来的。每一个真正关心祖国富强的共产党

人、革命干部和人民，都把大跃进运动看作是我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是我们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伟大成就，是我们的光荣和自豪，都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它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把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位置，因而不理解或不愿去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智慧、力量，这正是他们倒霉的原因。

三

大跃进运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用两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六亿多人民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斗争。尽管在大跃进中曾经出现过某些已经克服或正在克服的缺点，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大跃进的巨大成就和深远的意义却是主要的，基本的。

大跃进的胜利，不仅充分地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的完全正确性，证明了我国可以高速度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通过大跃进这一次伟大的实践，又向前发展了党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并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认识，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这样，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在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将发出更灿烂的光辉，产生更巨大的物质力量。

大家知道，人民公社化这一伟大的革命

①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运动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形成的。从一九五七年冬起，在我国广大农村，以大兴水利为起点，出现了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大规模的农村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原来规模小、单纯经营农业的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不能适合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产生能够在更大规模上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和加强统一领导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中，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新的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人民公社化搞快了，搞早了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是大跃进的必然的结果，而人民公社的建立又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

大跃进的巨大成就和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增强了我们的经济力量，而且大大的加速原来预计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我们提前三年完成、超额完成和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实现的指标，为今后的继续跃进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由于去年大跃进的结果，我们已经于去年在原煤、原木的产量方面超过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实现的指标；粮食、原盐的产量已经达到原定一九六二年的指标。当调整后的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又将使我们在钢，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花，棉纱，机制纸等产量方面，完成、超额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今后三年中把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大大提高，并且可以腾出手来，用较多的力量来加强国民经济的某些薄弱环节，从而使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可以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并使原定在一九六七年实现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可以争取大大提前超额完成。”^①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将会有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将更加提高。这是多么壮丽的前景啊！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出现，是全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成果。而大跃进这一伟大实践的胜利，又进一步改变了人民的精神面貌。象去年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如果没有亿万群众广泛的大规模的互助协作，如果不是坚决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发挥冲天的干劲，那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使得人们在大规模的农林水利基本建设和其他生产活动中，打破了几千年来祖传的只顾本乡本土的狭隘观念，跳出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圈子，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实行共产主义的互助协作，这就不能不大大发扬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大跃进中英勇的劳动人民，坚决地摒弃了前进中的绊脚石，同那些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他们高举着总路线、大跃进的红旗，奋勇前进，敢想敢干，敢于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在祖国的土地上写下了多少可歌可颂的豪迈的诗篇。作为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全民炼钢铁运动，不仅炼出了千百万吨钢铁，而且起了炼人的作用，几千万劳动人民通过了这个伟大运动，破除了科学技术“高不可攀”的迷信，解放了思想，初步学会了较为复杂的炼钢铁的技术，增长了科学知识。在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人们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劳动竞赛，很多先进单位和个人热心地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传授自己的技术經驗和創造发明，帮助后进的单位和個人赶上自己的水平；很多企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和個人，都主动地同别的单位和個人进行协作，促进自己和別人的工作的共同发展和提高。这一切，說明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大高涨，这正如列宁所說的，这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轉变的开端”。这一伟大的开端，已經产生了和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国大跃进的伟大胜利，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給以我們的援助分不开的。而大跃进的胜利，又大大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并鼓舞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們爭取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鼓舞了兄弟国家的人民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共产主义建設事业而继续奋

进。同时，我国大跃进的經驗，还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这是我国人民对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大貢獻。

綜上所述，可見我国全民大跃进的成就是极其伟大的，是任何敌人的誹謗攻訐所抹煞不了的。大跃进的出現是在我国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企图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是枉費心机的。大跃进的胜利雄辯地証实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整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而从这一切，只能得出“大跃进好得很！”的結論。不管国内外反动派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如何攻击污蔑，都不能改变我們事业的方向，不能动摇我們对事业、对未来的信心。

万众一心，高举总路綫的紅旗，跃进，再跃进！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日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热烈 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議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于八月三十日举行座談会，一致表示衷心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及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議，保証以实际行动投身到反右傾，鼓干劲的运动中，彻底粉碎国内外反动派对总路綫、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所散布的誹謗和謾言。

座談会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杜国庠主持，他說：党的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議公布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工农群众干劲冲天，立即以輝煌卓越的成績响应党的号召。哲学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有許多事情可做，应该而且可以来个大跃进。他号召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投身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好好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認識，在思想战綫上做出更大的成績来。

参加會議的人在发言中一致热烈响应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并从哲学原理、經濟规律及历史发展要求等各方面，說明我国在今年內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具有无比重大意义。并認为八中全会提出反右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是及时的，英明的，伟大的。中山大学校长許崇清說：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完全符合中国人民改变“一穷二白”的志愿；他認为过去我国在工农业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史无前例的，今后，只有認真开展增产节约，反对一切右傾保守思想，（下轉第16頁）

人民公社好得很

陈国璋

去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象野火春风一样迅速地在全国农村形成了燎原之势，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就公社化了。现在人民公社正象初升的太阳发出灿烂的光辉，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成就，不能不引起敌人的极大的恐慌。仇视我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国内外敌对分子，不断地造谣污蔑，幻想着：“人民公社计划已经失败”，企图影响我们队伍中某些不坚定分子，破坏我们的事业。但是这些恶狼和走狗们的任何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除了国内外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以外，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小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我们伟大的革命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他们反对几亿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他们抹煞几亿劳动人民的伟大成就，他们否定党对这个伟大运动的正确领导，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谬论，附和着国内外反动派的诽谤运动，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映。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这种反

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论调。

“人民公社搞糟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公社优越性的重要“论据”。这是一种污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象发射着强烈光辉的太阳，不是一片乌云所能掩盖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包括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可以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和分配，可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的劳动力，可以兴办农业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设，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的全面发展，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便于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加快农村整个生活的进步，便于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事业，在分配中可以有一定的供给成分，等等，所有这些优越性，将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来。”这是对公社优越性的全面的扼要的说明。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一大二公”。因为它的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就能够解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进一步发展生产时所碰到的不能解决的矛盾，更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如果从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来说，目前的人民公社同高级社是相同的，但两者又有显著的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扩大和提高，公社能够办到高级社所办不到的事情。两者比较起来，高级社是一个小集体，公社则是一个大得多的集体；高级社只是经营农业的经

济組織，公社則是綜合經營多种經濟事业，把工农兵学商結合起来，成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一組織，高級社只是集体生产的組織者，公社則同时又是集体生活的組織者；高級社还受到人力資源等方面局限性的制約，难于全面发展，公社則恰好克服了这种局限性，人多地多，資源丰富，便于进行綜合性的大规模的生产建設，能够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目前人民公社虽然以相当于原高級社的所有制为基础，但已經有了过去所沒有的部分的公社所有制，直接掌握着公社的公共經濟，目前虽还不很多，但每年可由生产队提取积累，加上国家的財政援助，其发展将是很快的，它代表着公社的远大的发展前途。在公社所有制中，实际上已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随着生产的发展，公社所有制的逐步增长，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也将逐步扩大，因此人民公社是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在目前虽然仍是社会主义性質，但其中已包含着高級社所沒有的共产主义的萌芽，所以說，人民公社也是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

因此，人民公社运动成为五亿多农民的自觉要求，而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可阻挡之势，并迅速的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經濟面貌，展示出农村的伟大远景，使广大农民从心坎里发出对人民公社热情的歌頌。

衡量人民公社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了，也就是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这一生产关系的改变，其好坏是看它是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須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客观規律，我們必須从这个基本点上来展开对人民公社优越性这一問題的探討。一年来的实践是檢驗公社优越性的客观标准，因此我們对問題的分析必須以客观的实际为根据。

現在我們看一看事实，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經過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五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35%，棉花实际收获量为4,200万担，比1957年增长28%，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都大大的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即粮食为3.7%，棉花为5%），多种經營和各种副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公社还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参加全民炼鋼，对全国工业作了极大的支援。显然，这是巨大的跃进。而今年的上半年，虽然播种面积减少了一些，并且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早稻、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都比去年有很大提高，总产量也超过了去年。今年早稻丰收还有以下几个特点：1. 大多数地区都是在去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取得了今年的更大丰收。如广东韶关市郊樟市人民公社在去年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又获得了全面的新的跃进，早稻大丰收，比去年同期多出售214万斤商品粮，工业、林牧副漁等項生产事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2. 一些历来低产的地区和低产田，今年早稻增产特别显著。如广东連阳自治县星子公社，亩产二三百斤的低产田占水稻总面积的60%，今年早造这些低产田的产量大部分都翻了半番甚至一番以上，全社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8.9%。3. 到处涌现出大批的大面积高额丰产田。如前面所說的星子公社，出现了41亩千斤亩，亩产800—1,000斤的有2,357亩。江西省遂川县有4万多亩早稻一季产量已提前八年跨过农业发展綱要指标，其中35,000多亩平均亩产815斤，6,400亩亩产1,015斤。

这两年来大丰收的事实，証明了人民公社是搞对了，而不是“搞糟了”。証明了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生产发展的結果来看公社的优越性，是再鮮明不过的了。

“人民公社比不上高級社”！这是右傾

机会主义分子否定公社运动的又一“論据”。对于这一論点，除上述所作的理論批判外，还可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当前的实践中显示得特別鮮明，而又是原高級社所难于办到的三个方面来加以批判。

一、組織规模大，活动范围广，有一定的公共积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公社組織规模大，活动范围广，便于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在广大范围内统筹人力、物力、資源和技术等，全面地发展农村經濟。原高級社因为规模小就难以作到。如樟市公社根据山多資源丰富、土地充足的自然条件和服从国家計劃的原則，因地制宜的全面安排生产。根据生产需要合理安排劳动力，組織专业队伍，以70%劳动力搞农业，20%搞工业和多种經營，10%为后勤人員。因而在取得早稻丰收的同时，工业及林牧副漁等項生产都迅速发展着。

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下，可以按照互助互利原則在公社内部大队与大队之間組織更大的更全面的大协作，这也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突出表现。这种协作关系不仅可以使各个生产大队得以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而且在抗击特大自然灾害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如广东今年遭遇了特大洪水，灾区的石滩公社两条保护万多亩农田的大堤围遭到极大的破坏，七条中小堤围冲坏了六条，要做好修复工作，必須在大暑前二十多天中做完28万土方，才能保証晚稻插秧，公社打破了队与队之間的界限，調动了二十九个大队五、六千人的力量，用集体的战斗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人民公社有一定的公共积累，这对于集体經濟的发展有特別重要的意义。目前公社有自己的公共經濟，又可逐年从各队提取适当的积累，它就可以拿来发展社办事业，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幫助穷队赶上富队。就以幫助穷队赶富队來說，如两阳县崗列公社的四围大队，原是經濟基础薄弱的生

产队之一，公社除了抽調干部去加强领导外，重要的就是从公社的公共积累中抽出4,500元，另在国家貸款中优先拨出16,000元，幫助四围大队解决生产資金的困难，經過半年奋战，就改变了穷面貌。早稻总产量38万多斤，增产22.4%，漁牧副业收入28,000多元，比去年早造增长两倍多；分配給社員34,000多元，增加八成；95%社員增加收入，全队已沒有超支戶。

公社所有制經濟的壮大促使穷队赶上富队，使队与队之間的貧富差别消灭或大大縮小，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当公社的經濟同时有了更大发展的时候，现有的三級所有制将逐步融合为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有利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人民公社这一方面的优越性虽还没有充分发挥，但已經可以看得出来。

公社公共經濟将会随着各生产队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因为生产队生产发展了就可能提供給公社更多的公共积累。而公社有了雄厚的經濟能力，又反过来进一步帮助各队的发展。公社公共經濟的发展，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漁和工农商学兵的全面发展，并进而可以购买新式农具，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开拓宽广的道路。如四川的紅光公社向国家购买了四十六台拖拉机，在每个管理区都建立了一个拖拉机队，去年秋天，广大土地就实现了机耕。广东花县花山公社經濟力量雄厚，今年新建立了拖拉机站和汽車运输站，拥有拖拉机十三台，汽車七部，晚造稻田大部分都用拖拉机耕种，社員摆脱了千百年来用人力犁田的繁重劳动。

二、集体福利事业的創辦和发展。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創辦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事业，使得广大妇女从繁杂的家务中彻底解放出来，参加生产，大大的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对于发展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农业社时期虽也办了一些集体福利事业，但由于公共积累微

薄，未能普遍兴办；公社化后才普遍创办起来，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继续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都提供了物质的保证。

三、公社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分配制度上的一个革命，广大劳动人民不但领得自己的工资，而且可以“食饭不要钱”，他们千百年来“愁吃愁穿”的心从此彻底放下了，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这就更进一步地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目前供给部分一般虽只占分配部分的30%左右，但它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由少到多。农民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并且从这里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幸福远景，因而心情舒畅，干劲冲天。公社成了他们的命根子，用原子弹也炸不散了。这就表现了人民公社不但充分发挥了高级社原有的积极性，又克服了高级社的某种局限性，而且还包含着远大理想的萌芽，因此以人民公社来代替高级社，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必然趋势，是完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

不能设想，人民公社这个新生的事物，在它一出现时就是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东西。这些缺点就是初办时期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某些集中过多和平均主义的倾向，以及某些浪费现象。但是这些缺点只是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问题。尽管如此，人民群众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进行了系统的整社工作，迅速地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这些缺点，使公社走上健全的发展道路。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伟大的，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而是要在实践中去取得，要取得经验就要花一点代价。谁想一点代价都不花，谁想在一个大的运动中一点缺

点也没有，谁就是革命的空谈家。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指摘他们呢？还是站在对面反对他们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指手划脚，散播悲观情绪，泼冷水，打击群众积极性，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必须指出阶级斗争目前在我国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目前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农村中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人民公社由于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它在我国条件下，不但是加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根绝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强有力武器，而且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手上掌握了这样强有力的武器，使我国飞跃发展，国内外害怕革命的反动派就更为惶恐不安了。正是这个原因，人民公社一出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便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人民公社指手划脚，附和了反动派的污蔑和诽谤。这就是目前斗争的阶级实质。列宁曾明确的指出：“对于革命中的困难和挫折表示幸灾乐祸，散布张惶心理，宣传开倒车——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列宁：伟大的创举）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公社运动的种种指责和污蔑，也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罢了。我国几亿劳动人民是不会受这种欺骗的，我们会更高的举起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勇往直前，为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光輝成就的一季

中共番順縣南村人民公社委員會第一書記 何木連

南村人民公社是由原來番禺縣南村、新造兩鄉五十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共同組織起來的。全社一萬另六百六十九戶，人口三萬五千六百多人，總耕地面積六萬四千四百多畝，其中稻田三萬一千八百多畝，屬丘陵地區，南面是連綿的小山崗，縣里有名的十里茶山就在這裡，北背珠江，河涌縱橫，水上交通較方便。南村人民公社建社到現在，雖然僅僅一年，但它的輝煌成就，足以證明人民公社在發展生產、提高生活等方面，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和巨大的生命力。特別是經過整頓鞏固之後，更走上了健全發展的道路。

講到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幾天也講不完，下面僅僅就南村公社一年來的成就和我們的亲身体會，講一講其中主要幾點：

首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有力量進行大規模的農林水利基本建設。我社屬於丘陵区，南面山崗連綿，水源不足，過去常鬧旱災，北邊靠近珠江，又常常受洪水咸潮侵襲。冲破水利關，是保證我社農業增產的關鍵，也是社員長期以來的願望。由於有公社的統一領導，可以在大隊與大隊之間，更好地組織人力和物力的協作，互相支援，使得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從去年到今春，我社建成了山塘水庫三十五宗，工程量達十三萬個土方，解決了一萬二千畝田的灌溉問題，並使它們具有三十天以上的抗旱能力；修築了大堤三十公里，計十五萬個土方，新建水閘十二宗，增強了防洪防潮的能力；此外還改善了排灌溝二十五公里。這

樣巨大的水利建設工程，如果沒有公社的統一領導，全面安排，是不可能短期內做到的。例如金坑大隊的壟尾水庫，需要一萬四千七百工才能建成，但全坑大隊只有八十戶，一百三十九個勞動力，本身只能解決二千七百工，依靠公社集體力量，由公社組織八百多人支援，僅十五天就建成了這個水庫。為了徹底过好水利關，今年我社還決定修建長達三十八公里的聯圍水利工程，這一工程需要投資十六萬元，涉及到八個大隊的利益，它建成後有一萬多畝田受益；此外還準備修建大小山塘一百三十宗，這樣宏偉的水利建設，沒有公社，也是辦不到的。

在綜合開發土地資源上，公社也發揮了它巨大的優越性。我社南邊的山崗，適宜種茶植果，可是千百年來對這些荒山無力加以利用。公社成立後，集中了全社力量，把這些荒山開發了，一舉就收到保持水土和種茶植果的兩方面利益，基本上建成了“十里茶山”，使種茶面積由二百六十六畝擴大至四千五百十六畝，增加了十六倍。我社瀕江地區，河道縱橫，荒涌不少，其中許多涉及到幾個村的利益，公社成立後，依靠統一安排、截灣取直，堵塞荒涌，不僅有利於航運，而且使荒涌變成魚塘，擴大魚塘養殖面積近一千畝。此外，我們公社還發揮了它財力、人力雄厚的特點，建立了陶器廠、磚瓦廠，利用新造地區優質陶土，燒陶制瓦，使磚瓦、日用和工業陶瓷器逐步達到自給。

其次，人民公社推動了工農業生產全面

发展,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力量,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经济落后的面貌,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上半年,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三百八十六万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三,纯收入为一百八十二万二千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十。今年早造的农作物,虽然遭到一百多年来未曾见过这样严重的水灾、风灾的袭击,但除了水稻又因播种面积减少,产值稍有降低以外,其他农作物的总产值达到三十二万元,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十一。其他林、渔、牧、副各业都以空前未有的幅度增长,同去年上半年比较,林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渔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二百一十五;畜牧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则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二百九十。

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工业生产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十一倍。目前公社已经拥有农具机械厂、化工厂、农副产品加工厂、造船厂等十二间工厂和绣花、五金修理、缝纫等九个加工场,此外各个大队都建立了为自己农业生产服务的农具厂等等,公社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整个公社对竹木农具、砖瓦、电池、生粉、白酒、酱油、木屐等需要都能做到自给,使一般机械修理可以自己解决,而且还试制了许多新式农具,制造了一部卡车,三只船和六百多部牛马车,促进技术革命的发展。这样巨大的工业生产建设的成就,决非高级农业社所能办到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属公社所有的集体经济迅速地壮大起来。今年上半年,公社直属生产单位的产品总值八十二万八千元,占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公社经济以工业为主,它除了包括上述十二个工厂和九个加工工场以外,还拥有八台发动机,两台电球,两部车床,三辆汽车,四台拖拉机,这就为农业生产走向机械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除了工业以外,

公社还拥有了耕牛增殖场、母畜母禽养殖场,渔业大队等经济单位。

随着整个公社的生产和社办经济事业的迅速发展,公社积累大大地增长起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公社的积累为二十六万三千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八。其中属公社直接支配的为十五万二千元,占全公社今年积累的百分之五十八。社办经济事业和公社积累的迅速壮大,不仅为公共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为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准备了财力、物力,而且使公社能够更好地帮助各个生产大队,特别是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同时,公社经济的壮大,又意味着公社中全民所有制因素的增长,这又为将来由农村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创造有利的条件。

由于整个公社经济的迅速发展,收入大大增加,社员生活得到了改善。目前全公社三十三个大队都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中有二十九个大队实行基本口粮供给制;四个大队实行伙食全供给制。实行这种部分供给制度,一方面使得贫困社员得到很大的好处,使得超支户由一九五八年的三千零九十三户减至今年上半年的八百七十九户,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一,超支金额由九万三千元减少到二万五千元,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部分大队(如官塘大队)更出现了消灭超支户,家家有积蓄,存款总额达一万三千元的可喜现象。另一方面,使社员按月或按季度领工资,使劳动力强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这样,就大大的刺激社员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总计今年上半年全公社分配金额共九十一万八千多元,平均每户收入为九十一元八角,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九。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文教福利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公社化以后新建立了社办中学一间,入学人数一百八十六人;社办农业中学一间,入学人数一百二

十八人；社、队办小学二十四間，入学人数五百多人；幼儿园三十六个，入园儿童一千五百五十四人；托儿所三十七所，入所儿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敬老院十四个，瞻养老人一百五十六人；产妇院二十二間；低費縫紉組二十九个；低費理发站五个；免費夜校十一間；免費保健站十七个；公共食堂六十二間，参加人数一万五千多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由于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的建立，广大的妇女摆脱了繁瑣的家务牵挂，愉快地参加工农业生产，为农村經濟建設增添了大批劳动力。

公社化以后人的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貧变富，超支戶变为盈余戶以外，还有五变：农民变技工；文盲变文明；家庭妇女变劳动能手；懶汉变积极分子；靠天吃飯、向自然屈服的思想变为敢想敢干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主人。公社化以后，随着社办工业的迅速发展，技术力量迅速地成长起来，到目前由社办工业訓練出来的技术人材，計有机械工三十人，司机十一人，电工十人，拖拉机手四十人；此外公社还拥有木工三百五十人，建筑工四百二十人，共八百六十一人，有了这一支技术力量，将促进今后技术革命的发展。随着公社化的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社員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革命高潮同时出现了。南村，这是一个充滿了哲学理論、詩情画意和冲天干劲的乡村，公社化以后，开展大规模的学文化学理論的运动，并形成了群众性的写詩歌热潮。許多人在扫盲运动中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例如官塘大队的林新貴，从小看牛，只字不識，参加扫盲学文化以后，现在已能够讀报。江南大队一社員刚刚脫了文盲帽子，就写了一首詩說：“文盲已有几十年，今日才得见青天。感謝中国共产党，今后学习更心坚。”許多干部在全民学理論运动中，学了不少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初步学会运用这些原理来处生产、工作和生活上的問題，

增强了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例如南村大队总支書記鄔巨洪学习理論后，写了一首詩，热情歌頌学理論的好处：“政治理論道理真，不懂哲学乱紛紛。原因未有經常学，工作难抓枉用心。自学毛主席著作，思想解放挖愚根，事物发展能掌握，工作跃进不后人。”广大的社員在实际斗争中，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文章和詩歌，在短短的一年內，写出了十五万首詩歌。正如官塘大队社員林銘張說：“南村有名詩歌乡，群众写詩千万张，张张写出新形势，篇篇写出远景长。劳动一歇就写詩，谷滿仓时詩滿牆。”許多妇女在公社大办福利事业后，摆脱了家务的牵挂，专心生产，成了劳动能手。例如官塘大队刘之的老婆由于四个孩子都入学入托，无牵无挂地参加劳动，成了模范，得了奖。公社化、大跃进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也革掉了人們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气，使得懶汉也变了，仅仅西組大队，就改造了懶汉四十人，其中包括自称“平生爱吃新鮮米，有例唔烧隔夜柴”的二流子崔細且，他现在已經变成生产上积极分子，在生产上带头干，他說：“现在人人为我，我也要努力为人人了”。特別显著的是人們政治思想面貌的变化。在去年水利建設高潮中，广大的社員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打破了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只顧本乡本土的狹隘观念，在共产主义的大协作中，舍己为公，服从整体，忘我劳动，提出了“苦战一冬一春，过好水利关”的响亮的口号，表现了人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大高涨；在各项生产和建設中，社員們打破听天由命的迷信，解放了思想，敢想敢干。这不仅表现于“月色蒙朧，东方未紅，男女老少，如虎如龙，开工鑼响，赶到田中”这种冲天的干劲上，也表现于大胆进行生产技术改革上，例如提早二个节令完成插秧；改革农具；打破对炼鋼鉄技术的迷信，炼出了大批鋼鉄。又如官塘大队建筑工，大胆創造，建筑了砖結構的拱頂无

梁柱的、能容納一千多座位的大會堂。通過幹部和羣眾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共同鬥爭，人與人的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無數幹部關心羣眾，羣眾體諒幹部，社員互相關心幫助，彼此同呼吸，共憂慮的動人事例，體現了黨羣關係的密切無間，增進了人們之間互助合作關係。這就說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革命羣眾運動，不僅改造着自然，改造着社會，而且也改造着人民自己。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脫離實際，脫離羣眾，站在羣眾運動的外面，故意誇大人民公

社建立初期工作中暫時的、局部的缺點，抹煞人民公社運動在改變農村落後的經濟面貌和人們思想面貌中的巨大成就，抹煞人民公社這些有目共見的優越性，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試問：如果真的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上面所舉的我們南村公社的這些成就是怎麼來的呢？！肯定的說：人民公社還成立不到一周年，就已經給我們帶來了這麼多的好處，今後，人民公社必然將以它巨大的優越性我們帶來更多更大的好處，一直到把我們帶進到無限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

(上接第8頁)才能堅持總路綫，繼續躍進。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付主任曾近義及該院教授唐陶華、中山大學教授董家遵及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黃剛、中山大學教授陳錫祺、何肇發等在發言中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去年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人民公社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他們對國內外反動派對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攻擊和誹謗，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董家遵從三個方面的事實駁斥了國內外反動派的誹謗和謾言：第一，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爭取兩年完成；第二，廣東今年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災，北方也有旱災，我們幾個月就消滅了災區的受災痕跡，而且糧棉都能增產；第三，調整後的今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既照顧到生產，又照顧了生活，既按比例有計劃，又是高速度發展。這三個方面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偉大勝利。唐陶華也就經濟工作的大躍進帶來文化教育事業大躍進的事實，反擊國內外反動派的污蔑，他說：我國教育事業幾年來有了巨大的發展，僅廣州市高等學校校數即比解放前增加了几倍，學生人數的增加更是解放前所不能比擬，教學質量也有了極大的提高，加上農村的農業中學的迅速發展，掃盲成績巨大，這也說明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績是偉大的，國內外敵人散布謠言想動搖我們人民的意志是徒勞的。曾近義說：這次黨號召我們反右傾鼓干劲開展增產節約，我們知識分子應該在運動中武裝思想，提高認識，克服自己的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做堅決鬥爭，才能堅持總路綫，繼續大躍進，保衛人民公社的偉大成就。

參加座談會的人都認為哲學社會科學界應該立即行動起來，投進反右傾、鼓干劲，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首先要端正認識，澄清各種錯誤思想；深入實際聯繫羣眾，在各個戰綫上做出成績來迎接國慶十周年。華南師範學院副院長汪德亮表示在教育工作崗位上堅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提高教學質量，結合勞動生產，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孫孺表示要進一步貫徹科學為政治與生產服務的方針，組織研究人員深入工廠農村，加強對實際問題的研究，宣揚總路綫、大躍進的偉大成就和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性，以反擊國內外反動派的污蔑，駁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誹謗，同時，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方面做出成績，向偉大的十周年國慶獻禮。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从新会县环城人民公社建立前后的一些材料驳斥对人民公社的污蔑

吳 修

我国广大农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运动的开始和发展，不仅是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同时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崇高愿望。正因为如此，当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发现农民群众的这一伟大的创举并加以倡导之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有如水归大海，以不可阻挡之势普遍地迅速地发展起来。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就在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但农村人民公社一经建立起来，又以它的巨大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

所有这些，都已经为人民公社诞生一年的历史所证明。在这短短的一年中，我国取得了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取得了1959年上半年的继续跃进。被这种一日千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吓得直冒冷汗的国内外反动派，象“群犬吠日”那样，发出猖狂的狂吠。当然，群犬的猖狂，是丝毫也不会减弱太阳的光辉的，终有一天，强烈的阳光，会逼使这些疯狗夹起尾巴不再作声。在我们人民队伍的内部也有一些那样的人，他们在这伟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面前，初则忧心忡忡，张皇失措，继而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胡说什么“人民公社缺乏

客观物质基础，……是少数人裹起来的”，胡说什么“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这些人活象骑着瞎马的盲人，就这样，一头撞进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

事实是最雄辩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现在，我们就从新会县环城人民公社建立一年的历史事实，从这个公社建立前后的一些具体材料，看看到底是五亿多农民群众干得对呢，还是极少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得对？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环城人民公社连非农业人口在内，现有11,391户，45,461人。农业人口达9,573户，40,202人；其中有劳动力17,597个。耕地面积75,786亩，其中54%是沙田，46%是民田和围田。公社位于新会县会城镇四郊，并与江门市为邻，交通方便，以粮食、经济作物和瓜果蔬菜的生产为主，是个比较富庶的半经济作物地区。公社建立前，原有分属于环城、三和两乡的2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8月末建立公社。

环城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党的领导下，从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之后，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也一年比一年提高。1957年总收入6,170,820元，纯收入平均每户394元，每人97元3角。1958年总收入7,504,980元，比57年增长21.6%，纯收入平均每户450元，每人107元。1959年上半年总收入2,940,670元（还有30多万元的工业产值因已转由国营

的商业供销部门办理，故未列入数内），比58年同期增长16.1%。现在，环城公社的全体干部和社员，正在鼓足干劲，力争晚造的特大丰收，发展多种经营，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

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在人民公社化前夕，原环城乡和三和乡的26个农业合作社，也正处于大跃进的形势中。大跃进要求高速度的发展生产，而要保证农业的高额增产，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根本改变自然面貌的农田基本建设，采取新的农业技术措施；必须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进行农具的技术改革；必须在较大范围的地区内进行协作，以便因地制宜，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发掘生产的潜力；必须开展文化革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技术力量……。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下子都拥到所有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和社员面前。

但是，由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规模小，活动范围窄，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原环城乡和三和乡2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七万多亩水稻和经济作物，每年都受着程度不同的水旱灾的威胁，1954年的一次洪水，两个乡的损失就达几十万元。因此，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保证粮食的高额增长，必须首先解决水利关的问题。这就要兴修金牛头(地名)水闸工程。这个水闸工程要横跨十五丈宽的河面，投资额达25万元。多少年来，人人都知道这是彻底战胜世代水旱灾的关键，但是，在各个合作社独立经营的情况下，由于工程费的负担和受益的问题始终不能合理解决。解放前不必说了，就是合作化以后，也是无法解决的。从进一步发展生产来说，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就农业社的组织形式来说，这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的到来，就更加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这2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自然环境各有不同，但都一方面具有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一方面又存在各种困难；虽然进行过相互之间的协作，但由于每个社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可能在统一领导下因地制宜，合理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的潜力，这就大大地妨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仁义社虽然拥有大量的机模沙和耐火泥，只要组织劳动力取沙和开办耐火砖厂，就可以大大增加收入，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一直无法利用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奇榜社与都会社毗邻。奇榜社部分社员具有从河涌捞取鱼苗的技术，但鱼塘很少。都会社有不少鱼塘，却又没有鱼苗。1958年春，奇榜社捞到30多万尾鱼苗，想卖给都会社，都会社也需要大量的鱼苗，可就是因为互利的问题没有解决，谈不成交易，结果奇榜社的鱼苗都挤在几口鱼塘里，死了将近一半，而都会社的鱼塘则因为缺乏鱼苗放空了半年，造成了双方在生产上的很大损失。奇榜社的土地有一部分分散在都会、大濠、城乡等社的界内，出勤时要跑半天的路，耕作、排灌、管理都很困难，又因为都会、大濠、城乡等社没有土地在奇榜社界内，不能进行交换，结果年年丢荒，使好田变成坏田。

总之，象这样一些妨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时刻都在苦恼着农业社的干部和影响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都意识到，在达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生产水平之后，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是困难的。

因此，他们从1958年春就开始摸索解决问题的道路。

现在合并成环城人民公社的两个大乡之一的三和乡基层党委，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在1958年五月间，曾采取了小社并大社的措施，把全乡12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三个各有一千户以上的大社。小社并大社，对于解决大跃

进形势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天馬社为例。天馬社是由七个小社合并起来的一个拥有1,600多户的大社，但在资金、劳动力方面，仍然无法兴修象金牛头水閘那样大型的水利工程。天馬社的耕地，絕大多数属于粘土地，必須进行入沙改土，才能提高产量，但这个社的范围内沒有沙，要从仁义、奇榜社取沙，改良土壤的进行就有許多困难。至于发展工业方面的困难，更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因为农业社在资金、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力量方面的条件都很不平衡，不是缺这样，就是缺那样，这些困难，使得各个农业社在进一步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上，受到很大的束縛。

这种并了大社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情况，又重新苦恼着天馬社的社員群众和干部，他們不得不繼續摸索，希望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出路。

出路何在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的走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就是要以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的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来代替规模小、单纯經營农业生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环城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們那么热烈拥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号召，为什么在被批准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那么欢天喜地地扛着紅紙金字的大双“喜”，舞起獅子，高举彩旗，到处游行，欢呼环城人民公社成立的原因。

能够說这样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是“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只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是少数人裹起来的”嗎？不！只要誰不是閉着眼睛瞎說，就应当承認这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这里有一个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客观物质基础”和“客观必然产物”的问题。

作为人民公社的客观物质基础，当然是

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其主要标志。我們认为，应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来理解这一问题。当我国广大农村由于生产的大跃进而感到高级农业合作社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束縛，要求有一种与这种大跃进中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就应该承認，新的生产关系，即人民公社的出现，已經具有了“客观物质基础”。而全国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組織人民公社的热烈情緒，則是人民公社賴以誕生的客观物质基础已經具备的具体反映。我們认为，决不能用机械唯物論的观点来理解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以为必須有大量的拖拉机以及其他大型的农业机械，才算具备了“客观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就叫做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其实，說穿了这只是老问题的新論調。不久以前，在我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中，不是也有人用这种观点和論調来反对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嗎？那时，他們也这样說：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已經“超过了实际可能”，因为那时我們也是只有很少的拖拉机和其他的农业机械。但是，我国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历史事实，早已把这种观点和論調彻底駁倒。现在，建立还只有短短一年时间的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事实，同样会把这种观点和論調彻底粉碎。

在这个问题上，环城人民公社建立前夕的这些具体材料，不正好給予有力的回答了嗎？

环城人民公社建立以前原环城乡和三和乡二十六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些基本情况說明什么呢？

首先，这些基本情况說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民群众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之后，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农民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生产还有很大的潜力，他們要求进一步发展生产，以便繼續提高生活水平。其次，这些基本情况說明，由于1958年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农民群众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的措施和根本改变自然面貌的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設，要求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要求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变經濟面貌；但是规模小、資金少、劳动力不足而且是单纯經營农业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却和这些要求不相适应。再次，在大跃进形势之下，农民群众中大兴协作之风，以克服发展生产中的困难和障碍；但是，不同經濟单位的不同利益，在沒有統一的领导下，就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作全面的考虑，以便在更符合經濟效果的原則下，进行全面的多方协作，这就使这种协作关系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以致由于各顧自己的利益，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这些情况，充分說明在我国农村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以适应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同时，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为改变生产关系創造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面对着当时农村經濟发展中的这些情况，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闭上眼睛采取右傾的促退的态度？还是正視矛盾采取革命的促进的态度？事实已經証明，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采取了革命的促进的态度，而那些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則采取了右傾的促退的态度。

环城人民公社建立前夕的这些情况以及这些情况所說明的問題，証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是我国农村經濟发展的必然产物，真所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也就給这些叫嚷“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一記响亮的耳光。

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相反，广大的农民群众用最大的热情来謳歌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看做是到达共产主义“天堂”的梯子。为什么广大的农民群众和这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同一事物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呢？問

題在于所有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都是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套中人”，而广大农民群众則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和創造者，是人民公社带来的好处的直接承受人。不管你找到的是公社干部还是一个普通的社員，一談起人民公社的好处，他們就都会一一給你列举出来。我們下面談到的环城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所显示的巨大优越性，还只能說是人民公社运动的初捷，而且不免挂一漏万！

环城人民公社建立不久，就遵照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決議的精神，进行整頓和巩固工作，克服了曾經出现过的某些权力集中过多、分配上某些平均主义和某些浪費的现象，并根据分級管理、分級核算，在目前阶段实行公社的生产資料三級所有制（生产队一級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級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有小部分的所有权）的原則，实行政社合一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并貫徹按劳分配的原則。实践証明，这样的組織形式，既能充分发挥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又能够克服高級社的上述局限性。因为人民公社比起高級社來說，組織规模大得多了，活动范围广得多了，在公社統一领导下，可以統一筹划全公社的生产和分配，可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可以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設事业，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漁和工农商学兵的綜合发展，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便于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加快农村整个生活的进步。

例如为整个环城公社全体社員长期渴望的金牛头水閘，在公社成立之后馬上便动工兴建了。工程虽巨大，所需資金虽达二十五万元之多，但由于人民公社統一領導，統籌安排，保證了所需劳动力的調配；投資方面，由公社負担50%，其余資金当然較易筹集，由于公社的統籌安排，即按各生产大队（原高級社）土地受益程度，合理分配負担。就

这样，从公社誕生到今年八月間，就基本建成了一座橫跨十五丈河面的七孔大水閘，使整个公社基本过了水利关。这座大型水閘就在今年夏季抗击住了特大洪水，使46,000多亩水稻、果树和經濟作物摆脱了洪水的威胁。现在每个社員和干部只要一提起和自然灾害斗争，就要一再說到金牛头水閘，称赞人民公社好。因为所有的社員都知道，沒有人民公社，就沒有金牛头水閘，就战胜不了今年的特大洪水，就沒有今年早造的手收。

“穷队赶上富队，富队更加富裕”。这是环城人民公社給全体社員带来的又一最大好处，也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最显著的表现。过去城乡大队之所以比城南大队穷得多，而且老追不上来，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是因为城乡大队在高级社时未能充分发挥它的有利条件。城乡大队所在地就紧靠会城鎮，社員多懂得种植蔬菜，而且土地也适宜种植蔬菜，可是在公社成立前，城乡社根本不可能利用較多的土地来发展蔬菜生产，因为粮食問題尚須解决，而且还有上調任务，所以不得不用較多的土地来种水稻，在收益上大受影响。公社成立后，在公社的統一领导下，在更广的范围内筹划生产和分配，公社針对着城乡大队的情况調整了城乡大队的粮食上調任务，从因地制宜原則出发安排城乡大队多发展蔬菜生产，这就使城乡大队的收入大大增加。加上大力发展畜牧业（例如仅就养猪一項來說，现在平均每戶有5.33头）等等，仅仅經過一年的時間，社員收入就成倍地增加了。1958年上半年平均每戶純收入87元，而今年同期却为220元，增加一倍半。目前城乡大队的經濟收入水平已略略超过了城南大队，这就是說，公社的統一领导，充分发挥因地制宜的有利条件，为原来的穷队赶上富队創造了条件。那么，原来的富队呢？富队的生产与收入也同时在增长，富队更加富裕了。就以城南大队來說，1959年上半年的农副业（不包括工业）总收入达到

168,672元，比1958年同期的总收入135,123元增长了33,549元；农副业純收入总額达94,048元，比去年同期純收入89,003元增长5,045元，平均每戶純收入达195元，而去年同期平均每戶純收入只有168元。再以全公社最富裕的梅江大队來說，在公社統一领导、統一规划下，做到了因地制宜，发挥了生产潜力。梅江大队最适于发展經濟作物，全部生产以水稻、甘蔗、柑桔和葵为主。过去主要的困难是劳动力不足，畜力不足。平均每条耕牛要負担耕地170—180亩，水稻的耕作都解决不了，当然騰不出力量管理經濟作物，这对发展生产有很大的限制。公社化后，經過公社統一筹划，按等价交換原則調整耕牛余缺，梅江大队的耕牛增加到43条，这就大大减少了劳动力負担，使他們能騰出人手来管好收益更大的經濟作物。因此，虽然水稻生产面积并未减少，經濟作物种植面积也未扩大，但因为加强了管理，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整个大队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早造約增产30—40%，1959年早造总产值平均每戶达到600元，4至7月的純收入平均每戶达到279元，而去年早造平均每戶純收入只有203元。目前平均每戶有存款150元。这些都是在人民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围广的基础上，在公社統一安排生产，更有效地互相支援协作以便更好地做到因地制宜、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必然結果。

到底怎样叫做“搞糟了”呢？难道有那么一种組織形式，用不着一年的時間，就能把原来的穷队变富，又把原来的富队变得更富，这叫做“搞糟了”？！除了用头当脚走路的人，怎么会这样来理解問題呢？这种人，正如毛主席所說的“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說人民公社“搞糟了”的人，正是已經“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了。

环城公社成立后，借助于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動範圍廣，能夠統一籌劃全社生產和更有效地充分動員資金與安排勞動力這些比高級社遠為優越的條件，大力舉辦了許多過去高級社所不能舉辦的建設事業，特別是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工業生產，加快農林牧副漁和工商學兵的综合發展。過去高級社時，一般只是單純經營農副業，只能辦一些手工業的農具廠，想辦一些其他工廠就很困難，不是資金、原料不足就是技術力量成問題，但公社卻能夠沖破這些困難，解決得了資金和技術力量的問題，把農業與工業結合起來。环城公社建立后一年來，已建立了機械廠、磚廠、造船廠等62間工廠，在農具、運輸工具和農藥等製造上，在農產品加工上，對農業生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還組織了各種從事工業生產的專業隊伍，培養了今後大力發展農村工業的技術力量，據公社不完全統計，公社辦的工業有工人950人。各生產隊的農具廠、建築隊，農業、畜牧業和林业等技術人材，不下一千多人，約占全社一萬七千多個勞動力的一成以上，比公社化前約增加兩倍以上。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一般農民，在生產實踐中獲得了技術知識，如能修理、按裝和開發動機的就有30多人，能駕駛拖拉機、汽車和電船的有14人，會煉鐵的有30多人等等，都是新培養出來的工業技術人材。

更重要的是公社這樣大辦工業，還替公社集體經濟積累了大批資金，為今後公社集體經濟的迅速擴大和發展，為實現工農業同時并舉這條方針，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大大促進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环城公社成立一年來，目前已有工業積累8萬元，加上農業積累，共有公社積累857,510元，比過去二十個農業高級社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全年積累的總和還要多出76,876元。

公社化后，环城公社的畜牧事業獲得了

很大的發展。至1959年7月止，豬已發展到33,348頭，鵝發展到7,624只，鴨68,512只，雞72,981只，而公社化前26個高級社合計只有豬26,165頭，鵝1,588只，鴨17,521只，雞46,787只。由於成立人民公社，在統一領導下，為畜牧業發展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如解決了公社化前平原地區與山區之間耕牛的放牧問題。現在公社平原地區各大隊的耕牛，一過了農忙季節，就把耕牛集中到牧草豐富的山區去，由公社組織的牧牛隊管理飼養。社員們打趣說，我們公社給耕牛建立了“休養院”。的確，人民公社帶來的好處，連耕牛也享受到了，它們現在只只長得又壯又肥，這對公社農事耕作所需畜力問題的解決有不少的幫助。

人民公社這一個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它不僅僅是集體生產的組織者，而且又是集體生活的組織者。以上已經用具體事實說明，人民公社的成立能大大促進農村各種生產事業的飛躍發展，因此也就能夠壯大集體經濟，使農村經濟收入普遍增加，從而使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能舉辦更多更大的公共福利事業和文化事業。环城人民公社在其建立之始，就積極開展了公共福利事業和文化事業。在公共福利事業方面，首先是舉辦了公共食堂，其次是大量發展了托兒所和幼兒園。环城公社現有托兒所85間，入所兒童4,152人，幼兒園有46間，入園兒童5,526人。全公社90%的兒童都已入所入園。由於舉辦公共食堂和發展托兒所以及幼兒園，使婦女能參加生產，解放了婦女勞動力，目前全公社經常每天可增加勞動力1,700多個。解放婦女勞動力，使婦女參加生產，對生產事業的發展有着顯著的作用。例如九龍大隊今年早造播秧比去年快八天，就因為多了40多個婦女參加勞動。有些男社員說：“如果沒有這班女將，我們就不能提前插完。”舉辦福利事業解放婦女勞動力，不僅對解決農村勞動力困難，對生產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

对于增加社員收入、提高妇女地位，也有重要意义。公社还設立了敬老院，使无依无靠的老人可以在集体的关怀下安享晚年。此外，环城公社在卫生事业方面也做了許多福利工作。

在文化事业方面，公社成立后，民办小学的入学儿童人数增加了1,200人，98%以上的适龄儿童都上了学；开设民办中学一間，有学生230人，80%小学毕业生都上了中学，比过去每年进入中学学习的人数增加三倍，农民子弟紛紛入学，例如都会大队1957年只有两个中学生，现在已經有28个了。

所有以上这些公共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与人民公社的建立分不开。

由于人民公社促进了农村生产事业的大跃进，大大巩固和发展壮大了集体經濟，特别是人民公社已經具有了过去高級社时所不可能具有的部分的公社所有制，而且这种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将不断地迅速发展壮大，就使公社有可能不断举办对全社生产事业有利的大型基本建設，有能力用全公社的力量去扶助經濟比較落后的生产大队发展生产，以便迅速赶上比較富裕的大队。所有这些，都更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經濟的发展，保証着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和农村整个生活进步的实现。环城公社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的精神，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分配的总原則是：工資分配部分应占社員分配总数60%以上；各个大队根据本大队生产的不同情况，对供給部分作不同的处理，有的全包

粮食、半包粮食或除包粮食外还包医药、包生育、包殮葬等。工資最高者每月可达12元，最低者亦有5元。自建立公社以来，坚持实行月月发工資。实行这样的分配制度，就消灭了公社化以前的超支现象，保証了农民生活的稳定。在公社的生产迅速发展中，收入和分配都有不少增长：全公社总收入1957年为6,170,820元；1958年为7,504,990元，比57年增长21.6%；1959年上半年（至七月底止）为2,940,670元（尚有30多万元由供銷部門办理的工业产值未計在內），比1958年同期增长16.1%。就純收入看，1957年全社平均每戶394元，每人97.3元，1958年为平均每戶450元，平均每人107元，1959年上半年就农副业（不包括工业）部分計算的純收入，平均每戶164元。

环城人民公社的历史証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农村經濟发展的必然产物，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右傾机会主义者却說什么“人民公社缺乏客观物质基础……是少数人裹起来的”。环城人民公社的历史証明，人民公社給我国农民带来了說不完的好处；右傾机会主义者却說什么“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这里应该得出什么結論呢？結論只有一个：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領導下的五亿多农民群众干得很对，右傾机会主义者的一切污蔑都是毫无根据的，經不起历史事实的反駁的。这样，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場爭論中，右傾机会主义者就彻底輸光了。

“气可鼓而不可泄”，这句话里面，包含有如何正确地对待新生事物，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和如何正确地对待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問題。

論 “鼓 气”

陈 盈

“气可鼓而不可泄”，“鼓”誰的“气”呢？我們說，应当“鼓”新生事物之“气”，“鼓”革命群众之“气”，“鼓”同我們一起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同志的“气”；凡此三者，都不应当“泄”他們之“气”。

对于新生事物，对于革命群众，和对于我們的同志，是“鼓气”还是“泄气”呢？采取什么看法和什么态度，是大有关系的。

对于新生事物，必須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珍視它的出现，扶植它的生长，积极地保护它，使它不致受到任何伤害，这是真正的革命者所必須做到的。

但是，新生事物从旧的母胎誕生出来，在一定時間里，它和旧的物事相比較，总是显得比較弱，显得比較小，显得不那么完善和齐全的。只从表面上看問題的人，往往就因为这暫时的弱和小而忽略了它，对它采取冷淡輕視的态度，以为“不值一顧”。而习惯于用老眼光看事物的人，又总是对旧的事物“委曲宽容”，而对新生事物则“責备求全”的。新生事物既然处在萌芽状态，发育远未完全，用老眼光去看，必然觉得，它这也不象样，那也不象样，这也缺一点，那也缺一点，觉得它不是“一应俱全”，不是“尽善尽美”，有时甚至觉得它相当“难看”。要不是从本质从发展来看它，见到它今天虽然还是弱和小，将来却一定会变得强和大，今天虽然还是欠这缺那，将来却一定变得完备整齐，那末，对待新生事物就不可能有坚强的信心，和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相反，倒

会采取怀疑态度，和对它加以譏刺。

既然是怀疑和譏刺，也就不会对之“鼓气”而只会使之“泄气”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采取怀疑态度和加以譏刺，这

意味着什么呢？列宁曾經“一針见血”地指出过：“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階級反对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

对待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采取了怀疑和譏刺的态度的，他們只见到初办时期曾經由于缺乏經驗而产生的某些集中过多的傾向，某些平均主义的傾向，以及某些浪费现象，却见不到人民公社虽然在目前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其中已經包含着一些共产主义的萌芽，它不但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展示了我国农村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因此，他們对于人民公社这个历史发展的必产然物，这个几亿农民群众的伟大創造，就不是采取热烈欢迎，积极扶持和坚决保护的态度，大“鼓”群众之“气”；而是盲目叫嚷“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大“泄”群众之“气”，向群众大泼冷水。这样做的結果，就把他們自己放在同群众相对立，同社会主义事业相对立的地位。

对于新生事物采取錯誤态度的人，对于群众运动也一定采取錯誤态度。因为当万万千千的群众汹涌澎湃地行动起来，用“翻天覆地”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毅力，大破大立，是和那些非常害怕新生事物，非常害怕打乱他們所习惯了的常軌的人的想法大相违背的。在那些对于旧的事物可以“委曲宽容”，

对新生事物多方“求全责备”的人看来，群众的行动总是“愚蠢”的，“粗暴”的，“做得过分”的。所以群众运动一爆发，他们忙着的只是为旧的事物作保母，而不是积极地给新生事物作产婆。

毛主席早就指出过了，对待群众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区别。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相信而且尊重群众的革命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群众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要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运动。当运动出现暂时的困难和曲折的时候，我们要坚决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勇气，同群众一起战胜困难，绝不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群众之“气”，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认识到，群众运动一如毛主席所正确指出的，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因此，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如果出了一些偏差，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决不应该由此而弄得惊慌失措和产生悲观情绪。

因此，我们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总是以身在其中、同命运、共呼吸的心情，热烈地歌颂它，称赞它，觉得它“好得很”；总是想到要进一步大长群众志气，大“鼓”群众之“气”，把运动推向前进，而绝不应该去怯群众之胆，“泄”群众之“气”，把运动拉向后退。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们轻视群众又害怕群众。群众未有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把群众当成一无所知的“草屑木头”。当群众运动

一旦形成，他们又把群众视为“洪水猛兽”。他们总是觉得群众运动并不那么“循规蹈矩”，总是觉得“走得太快了”，“搞得有点糟”。

因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如同传说中好龙的叶公那样，群众的革命运动未有兴起，他们可以天天讲革命，讲发动群众，临到群众行动起来，他们就对群众运动害怕得很，不是“评头品足”，“吹毛求疵”，就是百般非议，诸多埋怨。他们开头之时，采取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态度，对群众运动这也指责，那也指责，为“糟得很”的反动论调作应声虫，把自己的双脚踏在危险的边缘，到了后来，他们如果不“临崖勒马”，再深陷一步，就会滚到同群众直接对立的反动毛坑里去。

大跃进，公社化，都是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对于这些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是热情支持，大“鼓”其“气”呢？还是怀疑讽刺，与反动论调“同声唱和”，大“泄”其“气”呢？这将判定一个人所站的位置。

既然新生事物不可能设想它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广大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地向前奔流，“挟泥沙以俱下”，不可能完全没有半点偏差，那末，在正确地对待新生事物和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当中，也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地对待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問題。

我们承认，新生事物、群众运动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难，产生一些缺点，甚至出现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也肯定地指出，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成绩是我们工作中的主流，是本质的东西；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是非主流、非本质的东西。其所以能够这样肯定地说，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的；我们的工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的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在

进行工作的时候，又是坚决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着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的。

自然，我們这样說，并不等于认为缺点錯誤的存在可以不必介意，不必克服和糾正了。任何缺点錯誤的存在，对我們的事業，对人民群众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决不容忍缺点錯誤的繼續存在，一旦发现，就要采取严肃認真的态度去克服它，糾正它。

但是，在对待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这个問題上，我們和那些站在新生事物和群众运动对面的人絕不相尙。他們是用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欣賞”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的。他們惟恐我們把缺点克服，把錯誤糾正，于他們有所不利。我們也和那些对于新生事物和群众运动指手划脚的人大不相同。他們置身事外，以为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与之无关，缺点錯誤的存在，正好証明他們的“正确”。这两类人，都是要否定或者縮小我們工作中的成績，而夸大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的。他們都对那些已經克服的、暫时的、局部的缺点特別感到有兴趣，或者利用它来乘机污蔑我們，或者利用它来譏刺我們，总之是要以此来“泄”我們之“气”，“泄”群众之“气”。

我們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錯誤，認定它是必須克服和糾正，同时也是一定可以克服和

糾正的；我們克服缺点和糾正錯誤，是在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的前提下去进行的，是在大“鼓”干部和群众之“气”的前提下去进行的。因此，我們对于缺点錯誤决不掩飾隱瞞，我們如实地揭露它，分析它产生的原因，告訴干部和群众以克服和糾正的办法，然后同干部和群众一道，公开地克服缺点和糾正錯誤。但是，我們在如实地揭露缺点錯誤的同时，对于成績也要作如实的足够的估計。在克服缺点和糾正錯誤的时候，必須是滿腔热情和十分耐心的。缺点克服、錯誤糾正之后，干部和群众必須是信心倍增而不是信心消失；必須是积极性进一步發揮而不是积极性受到挫伤；必須是起了“鼓气”的积极作用而不是起了“泄气”的消极作用；必須是有助于新生事物的成长、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前进，而不是有碍于新生事物的成长、有害于群众运动的前进。

由此看来，“气可鼓而不可泄”这句话，就不仅仅是一个“鼓劲”的方法問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政治思想工作問題，我們必須从正确地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和正确地对待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这些方面来加以考虑，我們才能够对它有更深刻的理解。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

王致远

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必須貫徹理論和实际密切結合的方針，这是沒有人怀疑的。問題是在今天形势下，对这一方針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如何具体貫徹。

理論和实际相結合 就是有的放矢

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頓党的作风”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論学习等文件中，对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方針，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他指出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

“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整頓党的作风”中，他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来講，就是‘有的放矢’。……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們善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說，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实际相联系。”这就是对理論和实际相結合或相联系的最正确的解释。这几段話告訴我們：学习理論，不

应当把它当成死的教条，而是要从它找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理論应当和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結合起来，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創造。要“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见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論学习）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才能真正学会、学好。只講理論，就将是空洞的；只講现状，就将是零碎的。把理論和实际相割裂，不是教条主义，便是經驗主义。由此可见，我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任何时候都要貫徹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方針，任何时候都要反对理論和实际相割裂的形而上学。把理論当教条，为学理論而学理論，固然应该反对；輕視理論，不重視讀書，也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精神。

不同形势有不同的要求和方法

学习理論，要貫徹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方針，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势下，貫徹这个方針应有不同的要求和方法。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真理总是具体的。对于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一般地議論是不能解决問題的。我們的一切工作和学习，必須以客观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当前来談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問題，就必须从今天理論学习的具体情况出发，否則就会成为抽象、空洞的議論。

今天理論工作和理論学习的现状跟整风运动时期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

在整风运动中，我們学习理論，強調反教条主义，強調要密切結合整风运动来学习，这是适合当时情况的。因为在斗争紧张的时期要系統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是有困难的。相反，結合运动却可以学到生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风中所采用的鳴放、辯論、結合閱讀文件的方法，也証明是一种好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学习理論，其效果也是很显著的。这些，我們都应该加以肯

定，并作为今天系統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基础。如果因为今天強調認真讀書，就怀疑甚至否定整风运动中学习理論的做法和成績，那是形而上学观点，是錯誤的。

现在，整风运动已經結束了，形势向前发展，許多情况和整风时已有所不同。旧的問題解决了，新的問題又产生了。要解决新的問題，也就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和办法。理論工作和理論学习中新的問題是什么呢？这就是理論还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貫徹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必須提倡認真讀書，加强理論学习，以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建国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党和毛主席在領導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它在革命与建設中获得重大发展，这是光輝的成就。但是，从理論工作和理論队伍來說，却落在革命与建設的实际需要后面。在革命与建設中所提出的許多新問題，需要从理論上加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釋和科学总结；艰巨而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設迫切需要加强馬列主义的指導；思想战綫上，也需要开展对資产階級思想观点的斗争，在学术領域的各个方面插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紅旗。和这种形势的需要相比較，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是很高，而是不很高；理論队伍不是很强大，而是不大不齊；我們不是讀書太多而是讀書太少。去年大跃进以来的事实証明：有一些問題，本来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有些同志不懂得，因而未能把工作做好，甚至犯了錯誤。党的方針政策是正确的，但由于我們某些同志的理論水平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对头，因而在理解和貫徹党的方針政策时出了偏差。这个事实教訓我們，要更好貫徹总路綫，不仅要充分發揮主观能动性，而且必須認識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而这就非認真讀書，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可。今天理論学习中的問題，

主要地已不是教条主义，因为這個問題經過整风，已基本解决了（当然，还有教条主义也仍应繼續反掉它。）。今天的問題，主要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須提倡認真讀書，尤其要認真学习政治經濟学。如果在形势已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仍然一般地強調反教条主义，或只強調实践而輕視讀書，忽視理論，那就是不識时务。

当然，对于不同对象來說，应有所側重，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应有所不同。經驗較多而讀書較少的人应多讀些书；讀書較多而实际經驗較少的人应多参加实际。工农学理論和知識分子学理論，普及与提高，其具体要求和办法也不能完全一样。但是，从总的方面來說，經過整风、反右、大跃进，我們都有較丰富的实际經驗和大量感性材料，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識則比較缺乏，因此，总的精神是应该提倡認真讀書。

認真讀書不等于脱离实际

認真讀書，这意味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刻苦钻研，弄通原理，把书讀懂；要深思苦想，領会书的精神实质，找到解决实际問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句話，要下苦功夫。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一知半解，夸夸其談，浅尝輒止，滿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或者讀了一段书，就要求立即运用去解决实际問題，如达不到目的，就說讀書无用，不愿讀下去，这些都不能算認真讀書。做什么，学什么，在实践中学习，这是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方法，用这种方法学习，也可以得到良好效果。但有人把这种方法看作理論学习唯一正确的方法，一提到認真讀書就目为教条主义，这看法未免有点片面。

提倡認真讀書，当然不能保証任何人都不会再产生教条主义。那些原来有教条主义毛病，在整风中又未彻底克服的人，在強調認真讀書之后，可能钻进去而钻不出来。比

方在今天有些人因強調認真讀書而對现实生活不很關心，甚至對反右傾、鼓干劲這樣重大的問題也不重視，或者把兩者對立起來，這自然是錯誤的，必須防止，必須糾正。但是，讀書與教條主義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關鍵在於是否有的放矢地讀書。正如實際不等於理論，但參加實際也不等於脫離理論一樣，理論不等於實際，但研究理論也不等於脫離實際。今天經過整風以後，我們已有條件可以防止教條主義。因此，我們應防止教條主義，但是不能因噎廢食。

我們學習理論，總是在一定的實踐基礎上、在一定的經驗水平上來理解書的原理，接受書的教益的。同樣一本書一個原理，經驗多的人可以體會多些、深些；經驗少的人就會體會得少些、淺些。我們在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前和在今天來研究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等問題，前後有不同的體會，也是這個道理。這說明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係，也說明好書不厭百回讀。但是，這不等於說，學習理論，只能學習和自己經驗有關的問題；不等於說只要直接經驗而輕視間接經驗。我們固然應該重視實踐，注意豐富我們的經驗，但是也應該注意吸取間接經驗，注意積累知識。一些問題，雖然今天因為沒有經驗或經驗不多，學習起來，體會不深，但是積累起來，等到有了經驗，就自然會聯繫起來。積累不是單純數量的增加，而是一個由淺入深、由低到高的過程。對於同等實踐基礎的人來說，知識積累多的人會比積累少的人在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時較全面而深刻些。知識積累越豐富，應用起來就越能得心應手；知識貧乏的人，就往往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覺。因此，一個人在知識方面，是應該有點“庫存”的，“庫存”空虛的人，在實際工作面前，總不免感到“供不應求”。當然，積累的不是有用的東西，而是死教條、無用的東西，那是另一回事。既然理論知識應該多所

積累，那就不能把認真讀書目為脫離實際；不能認為立刻用得到的東西才學，暫時用不到但將來會用到的東西就不學；不能認為“立竿見影”的就學，不能“立竿見影”的就不學；不能認為與當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有關的問題就學，基本知識就不必學。把理論和實際相聯繫，學以致用，理解為馬上學習，馬上聯繫；今天學，今天用，是很狹隘的。只要我們的学习是有的放矢的，能從今天革命與建設的需要出發；讀書時，能和现实生活聯繫起來；學後拿來應用於實際工作和實際生活中。只要能做到這樣，那就不能說讀書會脫離實際，產生教條主義。

學習、精通、運用是一個過程

和讀書會不會脫離實際有關的，還有一個學習、精通與運用的關係問題。有人把學習、精通和運用機械地割裂開來，好像單靠讀書就可以精通，未達到精通，就不能運用。有人則把學習、精通、運用完全看作一回事，低估學習、精通對於運用的重要性，不把學習、精通、運用看作是一個過程。這兩種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知道，精通與運用是一個辯證關係，應理解為一個過程，就不能一下同時達到。在沒有掌握到“矢”之前，怎能射“的”，又用什麼去射“的”呢？當然，把精通和運用孤立地機械地割裂開來，認為精通可以離開運用，單純靠讀書就可以達到，這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的原理的，也不符合實際情況。精通與運用，不僅是一種辯證的關係，而且是一個不斷反復、互為作用的過程。不運用不能真正精通，不精通也不能很好地運用。學習與運用，不斷反復，我們的馬列主義水平，就會逐步提高。因此，把精通看作單純讀書，把運用看作單純實踐，是不恰當的。但是，如果認為單靠做什麼，學什麼就可以精通馬列主義，一提到讀書，就認為是脫離實際，這和今天提倡認真讀書的

精神是不很一致的。虽然精通和运用是一个过程，那末，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个时候，就必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比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离职学习的时候，在规定的学习日里，尽管这时读书也要联系实际，要把现实生活和书本中的原理联系起来，但是在这时间里，其主要目的是读书，是精通，是掌握武器，为运用作准备。如果我们的学习是有的放矢的，那么，认为有先有后，又有什么不可呢？“运用”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一般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的过程，真正“运用”，既要确实懂得一般原理，又要详细分析具体问题的一切情况，决不能拿原理、公式来硬套，因此把“运用”看得太简单，要求在读书时就解决，这不但符合实际，而且不利于深入钻研理论。再说，所谓精通，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是比较而言，比较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吧了。要不断反复地学习和应用，才能逐步达到精通。因此，问题要看本领，看是否有的放矢，看是否把学习、精通、运用看作辩证的反复的过程，否则，就容易纠缠不清。

研究理论必须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相结合

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问题，还必须注意研究理论和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关系。毛主席讲理论学习，总提到研究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三个方面，并把三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或则只注重研究理论，或则只注重研究现状或历史。当然，我们学习理论，应以研究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无非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就容易迷失方向；没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就不能分析现状，理解现状，从复杂变化中

抓到现象的本质；而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资料，也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认清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比方，我们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如果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原理，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原理，关于农民问题和农业合作化等原理，同时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有关人民公社的材料，那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人民公社，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如果我们缺乏土改、以至解放前的变工队、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的历史知识与材料，那也就无法掌握到人民公社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能达到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一致性。有人怀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怀疑人民公社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除阶级的原因外，从认识上说，就因为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既不高，又缺乏历史知识，肤浅地从某些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来看问题。因此，要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必须把这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思、写、用相结合

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不仅要把研究理论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学、思、写、用四者相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如果不独立思考，不刻苦钻研，那是难有成效的。所谓认真读书，就是要思索、要苦思、要求甚解。不仅要真正读懂书中意思，而且要从正面、反面，从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来进行分析比较，把书读活。别人的辅导、启发对于读书当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主要还应靠自己独立思考。学而不用，那是教条主义；用而不学，则不能提高。学是为了用，用也可推进和加深学习。而且用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很有成效的学习。

1959年8月中旬脱稿

論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

鄭 淳

教師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說得完全些應該是：教師在黨的領導下，依教學相長的原則，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這是完整的統一的提法。但為了說明的方便起見，準備先談談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然後才談教師主導作用與黨的領導和教學相長的關係。

教師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就是說教師在教學中負着“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因而要求教師在講課、批改作業、輔導、答疑、領導實驗、實習、考試、評分等一系列教學工作中起主導作用，發揮主動精神，領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

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不是人們主觀規定的東西，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客觀的規律性，是由教學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教學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既具有一般認識過程的共通點，也有它自己的特殊點，最主要的特点是：教學是學生在教師領導下，在特定的環境、條件、組織形式、和特選的材料和方法之下，學習和掌握那些人類已知但他們尚未知的知識、技能等等東西，並在這基礎上形成世界觀、信念和發展智力、體力。所以，教學是一個師生共同勞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教、學生學，教師和學生、教和學是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個對立的統一。在這個矛盾統一體中教師是知識的已知方面，學生是知識的未知方面（就一般情況而論），通過教學這一過程，學生逐漸從沒有知識到

有知識，從不精確或不完全的知識到比較精確和比較完全的知識，也就是說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逐漸獲得知識、領會知識，認識世界和領會如何認識世界並進而領會如何改造世界。在這裡，矛盾的主要方面顯然是教師而非學生，要不然，學生就無從通過教學達到認識世界的結果，教學任務也就無法完成。根據矛盾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矛盾的主導作用方面的道理，教師在教學中所起的這種作用就是主導作用。所以教師的主導作用，是存在於教與學的矛盾發展中，是客觀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因此，任何企圖限制或取消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都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都是不能執行的，勉強執行必然損害教學的質量，影響學生的學習，妨害教學任務的完成。

但是，教師的主導作用雖然存在於教學的客觀現實中，却不能說自有教學現象以來，不管在任何社會條件下，教師的主導作用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質和量的區別。相反，它們之間是存在根本的區別的。因為教育固然是一種永恆的社會現象，但它更重要的是一種上層建築，它是要為基礎服務的。所以教育為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是各個社會所共同具有的性質。正因此，教育、教學以及產生於教學的本質的教師主導作用，就不能不受各種不同的社會條件、社會因素所制約。例如在階級社會里教育要為統治階級服務，因此教師的主導作用就是導向維護階

級統治和剝削，這和我們今天導向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為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服務是存在本質的區別的。教師的主導作用不單因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有質的不同，就是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同的。因為：一，教師主導作用的大小是和教育在個性形成中作用的大小直接相聯的。在階級社會里，由於存在階級對立和鬥爭，存在兩種對立的文化教育，在個性形成中教育的主導作用受到複雜的環境和其他各種因素的互相抵消和制約的，因之教師的主導作用也受到制約；相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於消滅了剝削階級，環境與教育的影響基本是統一的，很少存在互相對立互相制約的因素，教育在個性形成中的作用達到空前的高度，因之教師的主導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二，教師主導作用的大小是和師生關係的性質相關的，而師生關係的性質則決定於社會的性質。封建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封建的等級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師生關係反映着商品的買賣關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則兩種關係都有，這類師生關係都是有距離的，有根本矛盾的，這必然影響到教師的主導作用；相反，我們的師生關係反映着我們的社會性質，它是真正的民主平等、親密團結、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教師的主導作用就得到空前的發揮。三，教師主導作用的大小是和教師的積極性、教師的政治責任感密切相關的。而教師的積極性，政治責任感則是和教師的社會地位、物質待遇，政治覺悟程度的高低成正比的。社會主義社會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是前所未有的；經過歷次運動之後，教師的政治覺悟，已有很大的提高，這就使教師的主導作用，有可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總之，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教師的主導作用不單有了正確的方向，而且其作用之大，也是空前的。

有人認為既然教師只在教學中起主導作

用，那麼教師就可以不必對學生的全面發展負責，可以教書不教人。應該說，這是一種誤解。首先，由於教學是一個師生共同勞動的過程，只有雙方都積極主動，教學才能搞好；因此教師要教好就必須以學生也能學好為條件，所以管教就必須管學；管學就必須涉及學生的學習思想、學習態度等問題，因之教書就不能不教人。其次，教師要教好書，就必須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貫徹理論結合實踐的原則，因此就要求教學結合政治、結合生產和結合實際，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這樣，教書也就不能不教人了。第三，任何教學都會帶上教師的主觀色彩，如教師的世界觀和教學思想、工作態度等等，客觀上也對學生起着影響作用，所以認真地說，絕對教書不教人的純客觀教學是不存在的，超政治、純技術的教學，就是以資產階級思想教育學生。第四，我們今天的任何教學內容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學性，就是自然科學也充滿着唯物論、辯證法的思想，充滿着正確思維和嚴肅的科學態度等教育因素，正確講授這些教學內容，就必然起着教人的作用。總之，要真正教好書就必然要教好人，教書與教人是不可分的。學校的工作就是培養人，按黨規定的目標培養社會主義的新人，而學校經常的中心工作就是教學，故培養人的工作主要是通過教學來完成的。因此，教師對於學生的全面發展是不能不負責的。而且根據上面的分析，教書也必然要教人的，因此，那種認為教書可以不教人，教師可以不對學生的全面發展負責，顯然是對教學的本質缺乏認真的分析所造成的誤解（如果不是其他原因的話），同時也是一種不夠負責的表現。

但是，教師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教師的主導作用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一回事；而教師能否正確地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主導作用却是另一回事。因為前者是客觀規律性問題，而後者却是教師

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教师的主导作用是通过教师个人的活动来实现的，因而不能不受到教师个人的主观条件所制约。一般地说，教师的政治觉悟、业务水平越高，他的主导作用就越大，教学质量就越好，反之就越差。因此，教师要真正负起培养人的责任，要充分發揮主导作用，就必须努力改造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丰富自己的业务知識，这是每个負責任的教师所应努力的。目前存在的已經不是教师有无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多大的問題，而是教师能否充分發揮其主导作用的問題了。

可是这并不是說教师的主导作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可以由教师个人随意决定的。相反，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因为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而今天无产阶级的政治是由党来领导的，所以教育是党的事业，必须由党来领导。因此，作为教育的中心的教学及由教学的本质产生的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要由党来领导，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教师主导作用具有正确的方向，不能保证它符合于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培养目标的要求。任何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地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都是不正确的，很危险的，那实质上是一种为教育而教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反映，而且那样做了也必然损害了教师主导作用的真正发挥。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确处理了师生关系，及时解决了教与学的矛盾，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同时又不不断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端正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态度和学生的学习思想、学习态度以及为教师的业务提高创造条件，这样的教师主导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认为党的领导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能并存的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党的领导并没有代替或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反，党的领导正是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和保证。

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单要以党的领导为前

提，还要以教学相长原则为前提。教学相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教学中的运用，是师生民主平等关系在教学中的反映，同时也是由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劳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所谓师生民主平等关系，就是说师生在政治原则和科学真理面前，一视同仁，地位平等。学生要向教师学习，但也可以和教师争鸣、辩论，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批评教师；教师负责教育学生，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但如果学生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合乎政治原则或科学真理的，教师就要本着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精神向学生学习，以便矫正自己的错误，补充自己的不足，从而使自己有更正确的观点，更丰富的知识来教育学生，来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就是教学相长原则的运用。有人怀疑，师生民主平等、教学相长，学生敢于提出与教师不同的意见，而且的确已经提出不少比教师更正确的意见。这样，教师的主导作用还能发挥吗？对此，我们认为学生能提出比教师更好的意见，这首先是值得高兴的事，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其次我们认为学生的这些成绩仍然是教师教育的结果，“青胜于蓝”，但先得“出于蓝”。最后，如果教师不耻下问，不耻相师，善于学习，学生提了正确意见，正是学习的好机会，正是更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保证。所以问题不在于师生民主平等关系，教学相长原则妨碍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问题在于教师对这种关系这个原则抱着什么态度。教师态度正确了，师生民主平等关系就能够迅速建立，教学相长原则就能够很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会高涨，同样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就能够得到高度的发扬。所以它们之间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那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由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一切工作所必须共同遵循的准则，同时，师生民主平等关系又是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基本方面，因此，教学相长就成为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并且在—

定意义上又是它的保証。

总之，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党的領導、教学相长的原則是統一的，这也就是党的領導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的作用的統一。党的領導和教学相长的原則是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和保証，它既规定教师主导作用的范围，又給教师主导作用創造了条件，使教师主导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它們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約的統一的整體。因此任何輕視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或者脫离党的領導和教学相长的原則来強調教师的主导作用，都是不正确的。今天

党着重提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問題，一方面是为了糾正上述的两种偏向，使教师的主导作用放在恰当的地位上；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了适应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須在必要的前提下強調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經過了整风和教育革命之后，广大教师的政治觉悟和負責精神都有所提高，因此教师主导作用的問題，成为广大教师所共同关心的問題。因此在今天正确地認識教师的主导作用，进而达到正确地运用教师的主导作用，該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中山大学历史系科学研究工作干劲十足

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开展了反右傾、鼓干劲的学习运动后，全系师生都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各教研組采取积极措施，保証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还保証在原定三十多个研究項目上，新近增加許多項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由于坚决貫徹了党的教育方針，今年該系进行的各項科学研究，一般都比较紧密地結合教学与国家的需要，和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許多专著、論文都是为了准备某門課程的開設或为解决某一課程中的重要問題而进行的。該系还积极組織力量进行某些課程的教材建設工作，现已完成或国庆节可以基本完成的教材有：“亚洲各国现代史”（增訂版）、“西亚各国现代史讲义”、“世界近代史讲义”、“世界古代史讲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經濟史”等。

由于坚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群众路綫，师生合作从事科学研究；教师間也大興集体协作之风，老教师积极發揮专长，青年教师破除了迷信和解放了思想，認真地大搞科学研究。到今年国庆节时該系将可完成的集体項目有：“林則徐全集”，“曹操评价問題論文集”，“老子問題論文集”，“中国哲学簡史”，和“唐书”的标、校工作。老教师准备提出作为献礼的論文、专著，现已完成（包括最近已經发表和出版的）或基本完成的有二十多項。其中有杨荣国教授的“李翱思想批判”，“张載唯物主义思想”等专题論文；岑仲勉教授的“汉书西域传校释”一书和論文“白族溯源”等；梁方仲教授的“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賦統計”一书；金立熙、刘节等十多位教授亦将提出論文或专著多篇向国庆献礼。青年教师完成的論文，也有十篇左右。（玉遵）

对王季思先生“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 一文的意见

中山大学中文系三年級学生 裘汉康

讀了今年第四期在“理論与实践”上发表的王季思先生“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一文，觉得其中有些問題可以討論研究。

王先生承認宋词中某些詞存有健康的因素；但論及如何对待这个問題时，却不是指导讀者怎么去批判它，相反，倒似乎是在为这种不健康因素作辯解。他說：

“我們承認这些詞里有健康的因素，但我們的时代，难道跟这些作者的时代有任何共同之处嗎？难道我們也跟这些作者一样，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嗎？我認为問題主要不在乎这些詞里的不健康因素，而在于为什么別人不会跟这些因素共鳴，偏偏你会跟它共鳴？”并且認为：“你思想上如果有这些不健康的因素，不讀这些詞，它也是存在的。它不跟作品里的調儿共鳴，也可能和別的东西共鳴，如附和右派言論等。”（原文第二部分。着重点是我加的——康注）

王先生这段話虽然不是指一般的同学，仅就“有的同学”而言，但原文并没有講清楚是那些同学，也没有分析原因究竟何在，所以这样講法会給一般讀者一个感觉：似乎区别那些是宋词中有益的、无益的或有害的东西、分清健康与不健康的因素，这并不关紧要，不是問題的关键；重要的倒是讀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有没有問題。不应当一般地否認文艺欣賞者的思想感情在接受文艺作品影响中的作用；但是，王先生这种講法，却是把作品实际存在的客观影响作用和讀者主观思想

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論断。当然我們不否認：和这些詞中不健康因素发生共鳴的同学，他們的思想感情多少和那些詞人具有共同的基础。但这并不能反过来証明：这些詞中存在着的不健康因素是无关紧要的、是次要的；也不能象王先生那样，得出結論說这些同学如不和詞中不健康的調儿共鳴，就一定会和別的东西发生共鳴，如附和右派言論等。

我們和王季思先生在这个問題上的分歧是：怎样理解和估計文学对社会生活、对人們的作用。文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对于基础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而这正是通过它对人們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来实现的。文学在階級社会中是階級間的关系的最尖銳和忠实的描写，只不过它是用形象来表现社会的階級和集团成員的情感、利益、要求和愿望罢了。所以如果看不到或看輕了文学作品这种影响作用，就会忽視文艺成为政治思想战綫强有力的工具、成为階級斗争中强有力的斗争工具的作用和使命，从而抹煞了文艺的特質。宋词自然也不能例外。同时，从文学作品是作家有意識的創作来看，这种作用也是肯定的。因为“艺术是在人以把自己所反复思考、重复感到的东西传給別人为目的而从事于此——这是自明的事。”（普列汉諾夫：“艺术論”。轉引自“馬克思主义与文艺”第74頁）作家在提起笔杆、进行构思的时候，就給自己提出了某种社会目的，从特定階級、特定社会阶层的立

場上來理解所描写的現象的。在有階級的社會中，作品的階級性首先就決定於這一點，而它的思想傾向也主要決定於這一點。因此不同作品也就有了各自的特定的影響作用。如果認為詞作里的不健康因素是無關緊要的，那勢必會降低上述作家的世界觀在作品創作過程所起的作用。當然，藝術作品的思想傾向不只是從作家的主觀意圖來說明的，因為從作品中所得出的結論，不只是作家所要傾注到作品中去的那些東西。

我們不同意王先生上述觀點，還因為：王先生把一般情況下，讀者的思想感情與作品中某些因素發生共鳴的關係，說成是“一律這樣”、“固定不變”的東西。我們覺得在論及有的同學和宋詞中某些作品發生共鳴時，要考慮到這樣一個實際情況：這些具有不健康因素的作品，不僅大多數本身具有藝術感染力，而且在教學改革以前，也一向為專家、教授所推崇，青年學生剛踏進古典詩詞的大門，只見五彩繽紛的旗幟和一片叫好聲，因而有的人一時對某些作品發生共鳴，這是可以理解的，並不全是因為這些人的思想糟透了緣故，更不能與立場問題（如附和右派言論）相提並論。教學改革運動中所揭發出來的事實，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有的同學在中學時朝氣蓬勃、精神奮發，到了大學，由於以前教學中的“厚古薄今”傾向的影響，也相繼盲目的鑽進古紙堆中，並隨着長吁短嘆、自怨命薄了。所以不能以一般的情況來硬套這種比較特殊的實際。

更重要的是，如果王先生上述論點能夠成立，那麼對於古典文學遺產也無須乎做什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工作了；王先生自己這篇旨在分析批判宋詞的專文也變成多餘的了。一切文學研究、批評工作都得因部分讀者思想中有着不健康因素存在、反正總會和什麼發生共鳴而失去意義。這樣降低和取消批判古典作品中不健康因素的意義，就必然不能使我們所接受的是真正有益的東西。

王先生離開文學的客觀標準來評價文學，因而對許多作家的評價亦是從主觀感受出發。在具體分析詞人作品時，卻又講得很含糊、抽象。如論及婉約派言情之作時，王先生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的：“一般說有些感情表現得比較健康、真摯，有些就沾染了青樓調笑的作風，表現出種種虛情假意”，所以“就這方面說，李清照的成就要算最高，其次是晏幾道。柳永詞里還有不少寫得比較真摯動人，但糟粕也不少。南宋詞家里，姜夔較好，夢窗、梅溪的詞都很討厭”，又列舉小晏的“玉樓春”詞，秦觀的“鵲橋仙”詞等來說明，都加以肯定，這是王先生感到“這些詞的感情是真摯動人的，同時也可以為我們所接受，因為我們在愛情上也希望彼此真誠相待。”在具體分析豪放派詞人的愛情詞時，也是同樣用“感情都十分真摯”來肯定的，於是這兩派詞作在“感情真摯”這點上統一起來了。在論文中也對周邦彥等詞作提出了批判，但王先生感到的是：詞里有許多虛情假意的話，如“賓鴻漫說傳書，算過盡千情萬侶，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極難賦”，令人十分討厭。就是秦觀“慢剩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也顯得有許多造作，使人感到不真實。批判南宋夢窗、梅溪的詞也是這句話“都很討厭”。從這裡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是關於詞家的感情問題，也就是說，詞家的感情是否真摯，成為王先生肯定與否定某些詞作的標準。

關於具體作品所抒發的感情真不真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的確，感情有真有假。但是無論真也好、假也好，它總是和作家的政治思想聯繫着的。單純強調作品的感情這一點，就不全面。特別是詞人的感情，在階級社會中都打上了階級烙印，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不會莫名其妙地恨，因為愛或恨等等感情都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它們是觀念的東

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而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所以细细分析起来，真情假意都是有它的阶级根源的。王季思先生对宋词的肯定或否定的出发点是和我们有所不同的。我们从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这点出发，遵照毛主席关于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指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而不是以“感情”代替一切。其实，就具体词作的感情来分析，也并非表现“真挚感情”的作品都值得肯定、都是有益的。因为所谓真挚的感情，总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我们再具体来看看女词人在写怀春、写离愁别恨时，说词中感情真挚，那是千真万确的，但其中有很多却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如词中所表露出来的那种贵族女子空虚、寂寞、和懒散消沉的真情，不仅和我们这个时代激情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和南宋初期国破家亡的环境也不那么完全协调。由此可见，“真挚的感情”并不能作为评价作品的好坏、健康与否、价值大小和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而王先生正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宋词中那些有益、那些无益，因此是片面的。

王先生的主观感受的片面性还表现在把不同社会价值的作品拿来类比。如把小晏、秦观词中的一句、两句所表达的感情归结为：“这正是封建时代许多彼此相爱而无法结美满姻缘的青年男女的共同感受。一本‘梁祝哀史’、一部‘红楼梦’，主要表现的正是这种感情。”（原文第一部分。重着我加的——康注）这段话讲得有些含糊，似乎这些词作的意义与“梁祝哀史”、“红楼梦”差不多。其实，小晏、秦观的词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及人们思想感情的深度广度上，都是不能与“红楼梦”、“梁祝哀史”相提并论的。

我们觉得评价文学作品是必然要通过评论者的主观感受来说明的。但是问题也就在于：这种感受并不能说都是正确的，它必须是在与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真实性吻合的情况下，才有着实际意义。从上面这个部分的分析来看，王季思先生在评价宋词时却是较多的离开作品形象的具体内容来谈主观感受，并以主观感受到的词作感情真假和能否为我们今天所接受来代替文艺批评的标准，这样就必然不可能真正判别宋词中那些是有益的、那些又是无益或有害的，而这也正反映出王季思先生对其中部分长期喜爱过的作品，在教学改革以后，还流露出以前被引起共鸣时的那种感情，在这种感情影响下，就有了我们在前面分析到的评价宋词时的片面性。

我们说王季思先生这篇文章在评价宋词的角度和标准上有问题，也是因为下面这样一个原因：全文七千多字，王先生几乎没有一句谈到宋词的艺术表现，而只是在讲作品的感情和政治上、思想上的意义。给人的感觉是：好象这样一些悬在半空的有意义的感情就是我们今天从宋词中要接受的有益的东西。乍看起来，似乎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并做到了“政治第一”；但是实际上却正好走到相反的另一方面。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用具体生动的可感形象来反映现实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也因为艺术对生活的认识与反映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所以作品中的形象总是那么丰富多采和各有其独特性，而我们也正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作家的思想和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希腊古典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时所给我们的范例，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时给我们作出的榜样，都正好说明：必须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对艺术形象的实质做全面的客

观的分析（见恩格斯給拉薩尔的信，“馬、恩、列、斯論文艺”1958年重版本第15頁），才能提高人們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認識，也才能从中接受到真正有益的东西。同时，由于任何一个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認識作用和感染力量都是决定于构思与艺术体现的有机統一、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統一，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讲到文艺批評的标准时，指出文艺批評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又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強調說明：“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艺术的統一，内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無論政治上怎么进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对政治观点錯誤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观点而沒有艺术力量的所謂‘標語口号式’的傾向。我們應該进行文艺問題上的两条路綫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71頁）。这就很明确了，简单地認為只要有政治，就有艺术，忽視艺术的审美作用和技巧的重要性，并不是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在古典文学研究領域內，忽略对作家作品做具体的、历史的、思想的和艺术的分析，或者只以分析判断作家在对生活现象描写中的态度及所流露的感情、所表现的政治意义为限，是对馬克思主义簡單化理解的傾向。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評决不忽視文学艺术的特点，而正是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統一的程度，从思想傾向所賴以体现的艺术形象的鮮明个性等方面进行綜合的探討，来闡明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也就是肯定其中到底那些是可以吸收的有益东西。脱离艺术形象来研究評价艺术作品的所謂思想性、政治意义，必将导致和馬克思主义的相反一面。

王先生过去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上表现出来的“重艺术、輕政治”的傾向是比較严重的。多从艺术手法的高低来評价作品或者是

撇开思想内容一味欣赏警句名言，是教学改革以前王先生教学的基本特征。象津津乐道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是“我国抒情詩里珍珠一样的名句。”讲到欧阳修的“蝶恋花”，也是不管詞中所流露的感伤情調，极力称赞这首詞写得如何“含蓄、精練、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讲关汉卿的杂剧，重点不是放在“竇娥冤”等战斗性强而艺术性也达到高度的代表作，就是在讲“詐娘子調风月”、“謝天香”等作品，也是少讲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意义，讲得多的除了元人方言俗語、风土人情之外，特別推崇的是这支曲子怎么动听，那支曲子音調又如何美。在王先生的“宋元文学史讲义”中，对形式主义的格律詞人的所謂高度艺术技巧更是大加称赞。

教学改革以后，王先生逐步跳出“象牙之塔”，并有决心来批判过去的文艺观点，艺术趣味，试图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上的现象，这种努力是值得欢迎的，而且从近二年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来看，也确实有些成績。但結合着“从宋詞里接受有益的东西”这篇文章来看，我們感觉到王先生在克服“艺术第一”的思想的时候，有向它的相反的另一极端发展的趋势，即轉到強調政治性而忽略艺术性的傾向。这在具体評价宋詞时已有所表现。如：从某一詞作中抽出一、二句或者把本来意义不大的作品，牵强附会的把它和社会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籠統地强加在这类詞作，甚至是个別詞句上面。讲到小晏“玉楼春”詞，就說其中“欲将恩爱結来生，只恐来生緣又短”这两句所表达的青年男女的感受“有助于我們正确地認識封建社会，从而有助于我們更深地热爱今天的新社会”；讲到秦观的“望海潮”、李清照的“永遇乐”等詞，就說“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統治阶级的危机”。这种分析方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而这样的研究当然也就不能对宋词作出正确的评价，相反会引起读者思想上某些一时的混乱。因为按照王先生这样的分析，把几个到处可以用得上的空洞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不加区别的放在各种作品上面，其结果不是把有些套不上的东西排斥在“有益”的大门之外，就是使读者误解所谓接受“有益”的东西就是这样直接的受到一些笼统的社会教育。这样就把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简单化，并会影响读者庸俗地理解它。如何接受古典遗产、向古典作品学习些什么的问题，周扬同志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一文中讲到，对于古典文学艺术“我们必须是有选择地接受其中健康的、有生命的、有益于人民的部分”，而向民族遗产学习，“主要就是学习它的勇于揭露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技巧”。茅盾同志在今年二月间召开的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发言中也指出：向古典作品所表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学习，也不能简单化的理解，例如

“他们的‘仁’、‘义’、‘真理’，和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涵义有距离，可供我们学习的，不是他们为之杀身的‘仁’，为之舍身的‘义’，也不是他们的所谓‘真理’，而是他们不计较个人利益、坚贞不拔的精神。”他又讲到“我们还要学习古典作品的高超艺术。学习不是抄袭和硬搬，而是吸取它的精华作为养料，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我们现在要分析我国几千年来无数作家、艺术家所积累的经验，取其精华，加以发展，创造我国民族文艺的新技巧，要超过古人，达到新的高峰。”我以为这应该是我们从古典文学中、当然也是从宋词中所要接受的有益的东西。可是，王先生评价宋词的角度和标准却是不符合这个精神的。

尽管我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宋词的学习都很不够，了解也极有限，文章写得也相当粗糙，但把它作为学习宋词的笔记拿出来发表，希望得到王季思先生和读者的指正。



广东逻辑学学会筹备小组成立

广州逻辑学暑期学习班已于八月廿九日胜利结束。这次学习是以自学为主，通过反复钻研学习资料，提出问题，再组织辅导报告和讨论。学员们一致反映收获很大：主要是初步掌握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教学方法，明确了逻辑学学习、研究的方向，重视了逻辑学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提高了学习的信心和兴趣，进一步巩固了专业思想。

这个学习班，标志着广东省逻辑学工作者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开始。为了便于今后加强联系，交流逻辑学的学习心得和教学经验。在学习班的结业座谈会上，学员一致同意杜国庠同志的倡议，通过成立“广东逻辑学学会筹备小组”，选出杜国庠，李匡武，黄瑗等同志负责该小组的工作。现筹备小组已经开始进行工作，正在准备分期举行逻辑学的座谈会、讨论会，为明年参加全国性逻辑学讨论会做好准备。（黄瑗）

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和人的主觀能動作用

若 文

“……經濟規律是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本質，是這些現象和過程內部所固有的必然的、穩定的即重復的因果聯系和依賴關係。

“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客觀的規律。它們不依人們的意志而由一定的經濟條件所產生；這些條件消失，它們也隨着失掉效力。經濟規律是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它們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社會關係。

“人們不能任意地消滅或創造經濟規律。他們只能認識這些規律並利用它們來改變經濟關係以造福於社會。但是，人們根據已認識的規律和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來影響經濟，就可以促進新經濟關係及其所固有的新規律的產生。”

上面所引的一段話，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對於經濟規律的定義以及它的客觀性質和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相互關係的概括，也是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內容。正確地理解這一問題，對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學習它不僅是為了理解經濟規律和經濟範疇的一般定義；更重要的是用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知識來武裝我們的頭腦，使我們看清前途和確信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從而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促使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也就是說，我們的任務是在認識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改造世界。

辯證唯物主義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人的主觀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任何事物都必然遵循着它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軌道在不斷地運動、變化，這就是事物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由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內在聯系決定的。只要事物的性質沒有改變，不管人們意識到或是不意識到，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事物運動的規律都必然發生着它原有的作用。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同樣具有這種客觀性質，它是以一一定的經濟條件為前提，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例如，只要商品經濟存在，價值規律就必然發

生作用，人們不能改造它、消滅它。只有在經濟條件改變之後，商品經濟不存在了，價值規律的作用才會隨之退出歷史舞臺，失掉效力。

當人們沒有認識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實踐中違反它，或是雖然認識它而由於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可能利用它來達到自己預期的目的時，經濟規律就要自發地對人們發生強制的的作用。例如人類社會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必然要求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勞動分配和生產資料的分配有一定的比例，這是各個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經濟規律。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商品生產是由個別的、分散的私人生產者進行的，而由於存在着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可能有一個按一定比例以統一計劃來分配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勞動和生產資料的機構。商品生產者盲目地生產着商品，誰也不知道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是否為社會所需要。當這些商品進入市場之後，價值規律就通過供求關係表現為不斷波動的价格，生產多了，價格就下降，生產少了價格就上升。價格圍繞價值而發生的波動，使追求利潤的商品生產者將資本湧向當時可以獲利較多的部門，

从而实现劳动与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这样，价值规律就自发地起着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是在被动的地位。价值规律这种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当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没有改变以前，人们的意志是不可能改变或废除它的。

除了少数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个生产方式所共有、都发生作用之外，大多数的经济规律不是长久不变的。它们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作用。各个不同的生产方式，都有它的特有的经济规律。当经济条件改变了，新的生产方式代替了原有的旧的生产方式时，新的经济规律就随着新的经济条件的产生而产生并发生作用，旧的经济规律则随着旧的经济条件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失去作用。由于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原来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平均利润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等等都退出历史舞台，失去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规律就代之而登上历史舞台，发生作用。例如，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之代替资本主义经济，支配着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基础消失了，这一规律就失去其效力。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属于劳动人民所公有，进行生产已经不是为了取得资本主义利润，而是为了不断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通过广泛地采用先进技术来使生产不断扩大和不断完善。既然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者消费的增长就成为正比例，从而

就消除了产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产生的客观条件，它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臆造的。又如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为资本家所占有，劳动产品的分配必然是为了剥削阶级发财致富和损害直接生产者的利益。而当资本主义经济条件消失后，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所公有，社会产品是劳动生产者直接社会劳动的结果，属于劳动生产者所共有。劳动产品的分配就必然要根据有利于劳动生产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的原则来进行。因而，“按劳分配”的规律就产生并发生作用。这些都说明了，当经济条件改变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起了变化，旧的固有的经济规律就失去作用，而新的经济规律就必然产生并开始发生作用。

既然经济规律具有上述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人们不能改造它、消灭它。那么，是不是说，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消极地适应它们，接受它们自发的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呢？当然不能这样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者与机械唯物主义者不同，我们承认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意识决定于物质，是物质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但是又承认人的意识能动作用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的意识能动作用不仅可以影响事物，而且可以改变事物存在的状况，使旧事物所固有的规律因失去其所依据的条件而失去效用，或使其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并为新的事物所产生的规律开辟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

事物发展的规律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规律；一是社会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同样都是离开人的意志而必然地发生作用的。但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同，它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表现出来。经济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是生产关系的规

律。生产关系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所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都是人的活动的表现，没有人的活动，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本身就不存在。所以说，经济规律必然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固然，人的活动必须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人们在认识和依据经济规律的活动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它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的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就要求以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即是要求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代替阻碍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客观的必然性，任何人想违反这个规律都只是螳臂挡车，无能为力的。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不能自发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并取得胜利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认识和利用了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活动，这是完全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的，因而必然取得胜利；而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企图反抗这种变革，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因而它必然要失败，任何的挣扎也不可能挽救它灭亡的命运。

人们要充分發揮主观能动性，首先要正确認識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辯証唯物主义認為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經驗，就能深入地認識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找出它的发展的规律性，这时人们就不但認識到事物目前是怎样和根据什么在运动、变化、发展，而且还可能科学地預见到它的将来。这就是人的活动是有意識的、有目的活动的根据。人的主观能动性，就首

先表现于当我们行动之前，就已经預见到行动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总结了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的經驗，認識社会发展的规律，認識各个生产方式的经济现象和过程所固有的各种经济规律的科学。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家，根据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丰富的实践經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进一步認識了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发展规律。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总结了中國革命实践的丰富經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找出了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符合普遍真理的特殊的规律。我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政治经济学，就是通过文字的传达，吸取前人的实践經驗，認識社会主义建設中各种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客观规律。在目前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成了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不等的、同志式的、相互协作的、利害一致的关系；創造了广泛地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和研究的有利条件。这就为我们深入地認識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不断实践，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原理，总结实践的經驗，使我们已有的知識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認識过去沒有認識的规律。我們这种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認識的过程，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长久以来沒有認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沒有認識经济现象和过程的经济规律，因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受到一定的限度。只有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人们才真正認識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目前社会主义下，我們就更加有可能在深刻認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

度地發揮主觀能動作用，真正自覺地自由地進行活動。

我們在認識客觀規律的基礎上，自覺地利用被認識了的規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各種必要的條件，改變客觀世界，以達到自己預期的目的。這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以我國的情況來說，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自覺地運用了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一般規律和我國具體條件下的特殊規律性，領導全國人民，通過革命的武裝鬥爭，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過渡時期，實行農業和手工業合作化 and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改變了各種非社會主義經濟，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樣自覺地根據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的規律……等等經濟規律的要求，並發揮全國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制定了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不斷地使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趨於完善，大力進行技術改革，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獲得了大躍進的發展，這些都是我們黨和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在認識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極其生動的範例。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是以客觀經濟規律為其科學依據，同時又充分發揮群眾的主觀能動作用，因此是完全正確的。這從我國1958年工農業獲得空前大躍進的發展，1959年上半年的國民經濟又獲得新的巨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所顯示的無比的優越性等鐵的事實中，得到了無可辯駁的證明。因此，積極宣傳和學習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動員全國人民經常地鼓足干劲，貫徹黨的路線和方針政

策，積極地創造必要的條件，以推動社會主義經濟迅速向前發展，就成為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認為人的經濟活動可以超過客觀條件容許的程度、可以違背客觀規律的必然性。可是我們更加要反對那種把客觀規律偶像化的觀點，認為人在規律面前無能為力，或是認為不必做什麼努力，事物也會依照其客觀必然性發展，因而企圖消極地等待客觀條件的具備和成熟，等待社會自行向前發展。因為這是取消革命論和唯條件論，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對於客觀存在的作用。就以對按勞分配將來必然會被按需分配所代替這種經濟發展的必然性來說，如果我們不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不能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也就談不上什麼以按需分配來代替按勞分配。與這種消極的態度相反，我們正因為懂得按勞分配必然會被按需分配所代替，就要為促使這種必然性的實現而積極創造條件。這就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以便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儘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三大差別的消滅。這樣就能大大加速按需分配美景的早日實現。持有宿命論和消極等待思想的人不懂得，當我們認識了事物發展的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必然性之後，要改變事物的性質，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沒有人的努力，就是“萬事具備”了也不可能實現的。這種右傾的思想和觀點，是我們改造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的最危險的敵人。只有正確地認識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和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相互關係，既承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使我們的活動符合於客觀規律的要求，又要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經常地鼓足干劲，不在困難面前低頭，積極地創造有利條件，克服不利的條件，才能使我們的事業不斷地向前邁進。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比例问题

曾野夫

一、高速度与按比例之间的关系

去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是我们认真贯彻了总路线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挥冲天的干劲的结果。它既符合了高速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按比例有计划发展的要求。但是，我们在工作中，由于认识与掌握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就可能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实现今后国民经济更大更好的跃进，必须正确解决速度与比例问题。这就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的社会性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庞大的有机体，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着一个计划动作的经济机体。”这样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只能是有节奏地进行，即是说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以一定的比例关系为基础。如果离开一定的正确的比例关系，就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协调的高涨。

所谓高速度，一般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的高涨，而不是指某一部门或某一种产品的增长远远走在前头，而另一些部门、产品却停滞不前。至于比例，当然并不是随便的比例关系都是正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基本特点，并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而又从现有生产水平出发、充分估计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正确地反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才算是正确的、合乎高速度发展生产的要求。用尽可能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以便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如果离开“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孤立地“为比例而比例”，那就会失去依据，迷失方向。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可见，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乃是互为条件、互相联系着的。

然而，速度与比例毕竟是两个有区别的东西，“速度”表明生产增长的快慢，“比例”表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发展的对比关系。在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比例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制约的。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首先而且主要是以国民经济中的重点部门和主要产品的迅速增长为标志的。前面说到高速度一般是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全面的高涨，但这决不等于说各个部门或各种产品应该一视同仁，等量齐观。拿国民经济两大主要部门——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来说吧。它们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两个基本部门，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工业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它的发展水平代表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确定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时应该保证工业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农业有相应的发展。这样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不能不受到农业发展速度的制约。又如，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应该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保证重工业部门

以較高的速度优先发展，但这并不等于說可以忽視发展輕工业和农业，恰好相反，只有充分注意发展輕工业和农业，才能使重工业的优先迅速发展得到良好的保証。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工业中生产資料平均每年增长26%，消費資料平均每年增长13.5%。这里就可以看出，生产資料的增长与消費資料的增长有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資料的增长不能不受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的制約。国民經济的重点部門應該突出，但不能过分突出；鋼、煤、粮、棉的生产固然要高速度的发展，但也要相应的发展其他物质資料的生产。这种相互制約的关系，就是矛盾。这种矛盾正是客观經济过程的內在联系，和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关系的反映。也是速度与比例之間的矛盾的表现。此其一。

其二，国民經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之間的矛盾还表现在：高速度发展总是要求突破一定的比例关系，因而国民經济总会出现局部的不平衡现象；而按比例发展是要求国民經济在一定时期保持着相对的均衡状态。因而，在客观的經济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这种情况，同劳动群众的創造性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結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門中，总是有少数比較先进的生产者，他們采用着比較先进的生产技术，創造着比較先进的生产定額。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們的技术，达到了他們的定額，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的祝詞）这种社会生产发展的特点、规律性，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鮮明。1958年大跃进的无数事实表明：我国六亿多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的强烈愿望与冲天干劲，总是不断地向旧的事物冲击，从而突破了旧的定額、旧的指标。这样，国民經济发展中就必然会出现矛盾。

然而，有些同志却認为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在客观上是沒有矛盾的。这种见解，我是不同意的。假如承認这二者之間是一个关系，就应该承認这二者之間存在着需要解决的矛盾。恩格斯說得好：“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靜止的，沒有生命的各个单独的、相互并列的，或先后相繼的时候，我們在事物中自然会碰不到什么矛盾……。可是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观察事物时，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們就立刻碰到矛盾。”（“反杜林論”，1956年版，123頁）假如否認这二者之間在客观上有矛盾关系，就难以理解在国民經济发展中为什么会出现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斗争，从而也就难以理解社会經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揭示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促进国民經济的发展。那么，要怎样解决这二者之間的矛盾关系呢？第一，必須正确解决国民經济发展中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标志，这一方針不能动摇，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就是沒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政策，那就不能設想可以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經济工作中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就是調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既高速度又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唯一正确的方針。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所一再証实了的。第二，必須采取正确的积极的平衡的方法和态度，不断地去組織新的平衡。这就是不断地去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額，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額努力。这就是促进派的平衡方法。

当然，要大跃进，就不免会在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問題上以及人民經济生活方面带来一些紧张。会在原材料的供应上等方面出现一些困难。但是这种紧张、这种困难，只能

用鼓足干劲、挖掘潜力的办法去解决，絕不能容許用降低某一方面的发展速度的办法去解决，也絕不能拿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和綜合平衡的要求，作为掩飾右傾松勁的借口。当新的右傾松勁情緒在一部分干部中抬头滋长的今天，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們經濟工作者和經濟学界的注意、警惕。1957年不是有过庸俗的平衡論的教訓嗎？我想，重溫一次毛主席关于这个問題的教导是十分必要的。毛主席說：“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当然，那种認為不要平衡的自流論，也是錯誤的、不利于大跃进的，也要反对。

二、建設速度問題是摆在我們面前最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当我們探討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与比例的关系时，不能忘記：建設速度的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社会主义建設要快一点或慢一点，看来只是一个時間問題，其实这个快慢之爭乃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則爭論。速度問題既是一个严重的經濟問題，又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刘少奇同志說：“我們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經濟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設，才能尽快地巩固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國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因此，我們在安排国民經济的比例关系时，应该适应高速发展的要求，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經济。

快慢之爭，看来好象解决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一时期，有些同志在这个問題上仍会滋长右傾观点。关于这一点，党曾多次地經常地提醒人們注意。一九四九年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批判过那种“經濟恢复悲观論”，強調指出：中国經濟建設将不是很慢的，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計劃时，也曾批判了那种主张放慢速度的錯誤主张；在一九五五年冬农业合作化高潮所帶來的生产建設高潮时，毛主席就提出号召，要求全党全民又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計劃原来规定的速度，批判了当时的右傾保守思想，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从而促进了一九五六年的一跃；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党又及时地批駁了那种所謂“反冒进”的右傾論調，重申多快好省的方針，提出十五年在鋼鉄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口号；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成績，也是不断与“算賬派”、“促退派”的錯誤思想作斗争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这种历史的实践的教訓，說明我們在考虑国民經济的发展計劃时，应该經常把速度問題放在第一位；国民經济各个部門发展的比例关系应该适应高速度的要求。这一点，不仅因为有现实的需要，而且也由于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它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现象，建立了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关系；生产目的是为了不断地逐步地滿足全体社会成員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生活需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样的生产关系比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能够容許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沒有的速度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

步得到滿足。這就是社会主义經濟所以能够高速度发展的經濟基础。但是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仅仅为高速度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可能性。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还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良好的工作作风；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須通过人們的积极的正确的活动。因此，強調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作用和充分估計人民群众的創造作用，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有些同志在論述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时忽略了这方面。事实上是，充分地估計社会主义国家經濟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創造作用，正是我們在科学地認識和正确地运用經濟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中發揮主观能动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經濟作用，乃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了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資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絕對統治，使得国家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的經濟规律，自觉地把这些规律运用于自己的活动中，对国民經濟实行計劃領導，执行經濟組織的职能。但是，国家对經濟的有計劃的集中領導，还必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創造精神結合起来。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同样是在經濟工作中一条不可动搖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方針，也是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列宁同志一再強調、教导我們不要忘記这个观点。他說：“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靜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認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認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階級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組織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义。”（“反对抵制”一文。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第199頁，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是体现了这个原則精神。陶鑄同志在“总路綫与工作方法”一文中，談到“建設社会主义的速度与比例問題”时，首先就充分估計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創造作用。这种鮮明的坚定不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很值得我們学习的。

其次是：有些同志在談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时，諱言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需要之間的矛盾。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性質、上层建筑基本适合經濟基础的情况下仍有矛盾，只不过是这矛盾的性質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对抗性，而表现为非对抗性，并且解决矛盾的方法可以不通过劇烈的革命斗争、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調节罢了。特別在我們这样人口众多而經濟又落后的国家，生产与需要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承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目的是为了我們能够及时去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动力之一。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深刻闡述了这个原理：“……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时常經過国家計劃去調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积累和消費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間的平衡。”当然，决不能因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認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物資供应紧张的状况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我們在解决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問題时，正是應該考虑到消費品增长与社会购买力增长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物資供应与社会购买力之間的平衡，以保証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得到滿足。

尽管社会主义經濟的高速度发展表现为波浪式的一起一伏，但它仍然是前进的，而且始終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这是有我国建国

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了的。决不能认为这一年比上一年的增长率应该翻一番才算高速度，也不一定要一年比一年高的速度才算。一般说来，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工业每年增长20%以上就是跃进，增产25%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3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10%以上就是跃进，增产15%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2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我们认为高速度这个概念，包含二方面的意义，一是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而言，在这方面我们总是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二是在我们国家里，以现有的生产水平出发而又充分发挥生产潜力、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所能达到的速度，这就算是高速度。关于速度取决于什么条件，有人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技术条件即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有人则强调社会条件、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二个方面应该统一起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说：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我们逐步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越做越细致，我们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我们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最近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所制定的今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因而它完全符合这个精神。八中全会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分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诽谤和破坏，克服了妨害我们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调动了全党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能够继续高速度又是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让我们高举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去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定稿

“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第四期即将出版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第四期于十月一日出版。这一期的内容，着重介绍有关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最近印度尼西亚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财政困难问题。围绕这个中心，该刊本期选译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和若干负责同志论述印度尼西亚当前财政问题的论文及资料，如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所召开的经济讨论会的总结、萨基尔曼和鲁克曼等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经济与社会”创刊号（1959年4月出版）上发表的论文：“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财政”和“外国投资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地位的加强”等。此外还有关于印度尼西亚对外贸易的文章数篇。

该刊这一期还发表“欧洲共同市场与亚洲经济的整体化问题”、“菲律宾华侨经济与菲政府的排华政策”和“中国与新、马贸易的发展”……等文章。

按劳分配原則有没有“两面性”？

——与杨越同志商榷

董 崎

“理論与实践”今年第五期刊登了杨越同志的“关于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一文。讀后頗受启发。文内关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經濟規律，我們應該积极的利用这个經濟規律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并創造条件逐漸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过渡；不能把旧社会遺留下来的意識問題，同作为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按劳分配混为一談；我們应当加强党的領導，实行政治挂帅以保証“按劳分配”原則的正确貫徹执行……等論点和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在目前正确的論述这些問題，对于我們的实践活动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杨越同志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只是“合理程度的不同”；按劳分配原則“沒有两面性”等論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按劳分配的“两面性”問題，我認为只是客观存在的两个方面，并不等于就是“好”与“坏”，或“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运用得正确，它可以是“积极”的或“好”的，只有运用得不恰当，不能正确的安排它的两个方面，才会发生所謂“消极”的或“坏”的作用。

根据这个观点，我認为杨越同志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則与資本主义的“不劳而获，多劳少得”分配原則有着根本性質上的区别，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杨越同志說，按劳分配原則与按需分配原則“只是在合理性上存在程度上的不同”，那就不对了。應該看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間，是

有着質的差別的。按劳分配是在生产力不高，劳动尚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三个差别”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按需分配則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階級法权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經不起作用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情况下的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所以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不只是个程度上的、量的差别問題。两者的差别虽然不能一刀划开，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会有按需分配的成分的增长，但是，却不能由此而否定了两者之間的質的差别。不弄清楚这个問題，誤以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就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混乱。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区别問題，实质上是分配关系上，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否定资产階級式的权利的問題。按劳分配的原則固然从根本上取消了剝削，这一原則在根本性質上与資本主义分配原則对立起来。但是，按劳分配并没有彻底否定资产階級式的权利，要彻底的否定资产階級式的权利，还有待于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正如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既有

資本主义的残余的存在和逐漸消亡，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的存在和不断增长（当然后者是主要的）一样，而这个过渡时期的分配方式，也同样有其固有的两个方面，簡言之，即平等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

其次，杨樾同志說“按劳分配原則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經濟規律，就不應該有兩面性”。我認为这个邏輯是錯誤的。杨樾同志虽然指出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但是，認为它是客观規律就沒有“兩面性”，而只有“一面性”就不对了。在論述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时，杨樾同志也看到了資產階級式的权利的存在。但是，他却認为这是“外在”于按劳分配原則的。这里，我們要問：在分配領域里的資產階級式的权利是什么呢？是不是劳动人民内部在分配上的实际“不平等”呢？如果不是的話，又是什么呢？如果是的話，又怎能把它作为“外在”于按劳分配來說明按劳分配沒有“兩面性”呢？我認为“按劳分配”是客观經濟規律，但是它也具有兩面性，即它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彻底否定了剝削，实现了不受剝削的平等的一方面，同时它还有資產階級式的权利的另一方面，即在分配領域里，劳动人民内部在对个人消費品的分配上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这也是按劳分配所固有的、內在的一个方面。

按劳分配的“兩面性”，可以直接从按劳分配規律的要求本身找到根据。“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中指出：“按劳分配的經濟規律要求直接按照每个工作者的劳动数量和質量来分配产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不分性別、年齡、种族和民族，一律实行同工同酬”。在这一表述中，就清楚的表明了按劳分配的兩面性，因为按劳动数量和質量来分配产品，一律实行同工同酬，这較之資本主义的“不劳而获，多劳少获”已經是最大的平等了，然而各个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了婚的，有的

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儿女多些，有的儿女少些，以及諸如此类等等”。（列宁：“国家与革命”）所以按劳动数量和質量来分配产品，一律实行同工同酬，“这个平等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实行按劳分配，在劳动人民内部的产品分配上存在这种实际的“不平等”，不是十分明显的嗎？

在研究按劳分配这一經濟問題时，我們不應該离开一般的方法，即唯物辯証法。毛主席的“矛盾論”告訴我們：“不論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論是客观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按劳分配”既然不是什么“不可捉摸之物”，而是許許多多的客观經濟現象之一，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承認它是矛盾的現象呢？如果承認它是矛盾的現象，那么，它怎能“沒有兩面性”而只有“一面性”呢？杨樾同志否認了“按劳分配”的兩面性，我認为就是在分析这个問題时，沒有从它的矛盾性出发，忘記了“統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的各个部分的認識，是辯証法的实质……”（列宁：“談談辯証法”）这一基本原理。

再次，杨樾同志不得不承認“按劳分配”是資產階級式的权利，因为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論了。但是，杨樾同志在承認了之后，又引用了赫魯晓夫同志的“不能把权利形式同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混为一談”這句話，轉弯抹角的又把“按劳分配”的兩面性說成沒有了。赫魯晓夫同志所談的是按劳分配的形式和内容不能混淆，这怎么能証明資產階級式的权利是“外在”于“按劳分配”的、“按劳分配”是“沒有兩面性”的观点呢？就在杨樾同志引用的“不能把权利形式同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混为一談”這句話的前面，赫魯晓夫同志不是明白的指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是同工同酬。这就是說，对各种不同的人采用同一

的权利尺度。而劳动就是这种唯一的、对人人都一律平等的尺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阶级的不平等，只是还在产品分配上所得分额的不平等”。另外，难道杨懋同志不知道，形式与内容正是事物的两方面的这一真理吗？按劳分配的形式方面和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方面，不正是说明“按劳分配”本身固有着两面性吗？杨懋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认识某一客观事物的时候，不应当在关于这一事物的概念中加进任何非它所固有的东西”。我对按劳分配有“两面性”的看法，却不是对按劳分配提有什么“成见”，故意的去给按劳分配抹花脸，而是实事求是的从“按劳分配”自身就有两面性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

我认为正确的认识按劳分配的“两面

性”，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肯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它彻底否定了阶级剥削，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社会产品，实行同工同酬这一平等的一面，会使我们深刻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从而鼓舞人们热爱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正确的指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实行这一原则，在劳动人民内部，在分配方面还有实际上的“不平等”这一另一面，可以使我們更清楚的看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看到按劳分配还不是我們最理想的分配制度，从而鼓励人们不要满足现状，而要努力地去创造条件，以便将来从“按劳分配”原则过渡到“按需分配”原则。

更正本刊第八期第三頁倒数第四行“就都是真理而反面”应改为“就都是真理的反面”。第四頁第十二行“馬克思主义認識中論”应改为“馬克思主义認識論中”。同頁倒数第三行“无数的相对真之总和”应改为“无数的相对真理的总和”。第十頁左第二十七行“必須反对主观主义”应改为“必須反对主观主义和右傾保守思想”。同頁左第二十八行“看不到客观规律的決定作用”应改为“看不到客观规律的制約作用”。同頁左第三十至三十一行“后者則看不到主观能性的反作用”应改为“后者則看不到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第十五頁左第十三行“月季經濟計劃”应改为“月度經濟計劃”。本刊第六期三十二頁左第二十一行、第二十四行“永宋”都应改为“永乐”。第三十七頁左第十九行“展垆中出矿为堆”应改为“尽出垆中矿为堆”。本刊第六期“試論明代矿业中資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特点”一文中所引白寿彝文字，均见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載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

也談按勞分配與政治掛帥

——對楊樾同志“關於按勞分配與政治掛帥問題”一文的意思

廖慶新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客觀存在。它具有客觀性質，它的產生和發生作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能為人們的意志所創造、制定、改造或廢除。楊樾同志認為我們必須更好地認識它、依靠它、積極地利用它來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這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楊樾同志認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只是在合理性上存在程度上的不同；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唯一合理的分配制度；我國農村人民公社所實行的吃飯不要錢、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實質上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起作用的結果；隨着向共產主義的前進，按勞分配、物質利益原則將不是逐漸削弱而是繼續充分發展等等。這些論點與提法尚有進一步探討和商榷的必要。

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是否“只是在合理性上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呢？當然，“按需分配”比“按勞分配”是更合理的。但是，不能理解為只是合理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們必須進一步認識“按需分配”原則和“按勞分配”原則是兩個不同質的東西。雖然，兩者都必須以“各盡所能”為前提，但是，按勞分配的所謂“合理”或“平等”是以“勞動”為尺度來衡量，實際上，“這個平等的權利對於不同等的勞動是個不平等的權利”。就是說，對那些身體條件不同，勞動能力不同，子女多少不同的人來說，在事實

上仍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馬克思說，按勞分配的平等權利，“在原則上仍然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因為在這裡起作用的仍然是“那個調節商品交換的原則”，即“等價交換”的原則（但是，這並不是說，按勞分配原則是資本主義的分配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根本不存在什麼按勞分配原則的）。而按需分配的合理或平等則是以“人的合理需要”為尺度來衡量，任何盡了自己的能力的有勞動能力的人，和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如小孩、殘廢、老年人等，都可以平等地（不是平均地）得到他們各自所需要的一切合理的東西。不會因為身體條件差，勞動能力弱，子女多而使自己的物質生活處在不平等的狀態中。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的所謂合理或平等，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着絕然不同的含義。因此，這兩種分配原則並不只是在合理性上存在程度上的不同，而是在合理性上有着本質上的根本差別。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是唯一合理的分配制度的說法，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固然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以後，它就不能再被認為是唯一合理的分配制度了。因為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雖然“它的基本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是，另一方面，它已“開始帶有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萌芽”。它已突破了單純按勞分配的範疇，實質上是部分初級的（或低級的）按需分配和部分按

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杨懋同志并不否认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存在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却又认为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合理的分配制度。这是矛盾的，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实际情况的。

在这里，必须进一步探讨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这个分配制度是不是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是我国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展的产物。它是在某些社会产品已经相当丰富和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而不是根据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搞出来的。它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客观必然性。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它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马克思也说过：“消费品的任何一种分配，始终只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就是说，采取什么分配方式，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单纯的按劳分配制度和我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和生产大跃进以后的新的经济条件是存在着矛盾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方面继续起着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开始妨碍进一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如家庭子女多的人，看到生产发展了，大家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自己的生活却由于家庭负担重仍然得不到改善或改善得很少，很自然地会在思想上对按劳分配制度产生抱怨情绪而影响劳动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提高；反之，家庭负担轻，劳动能力强的人，则所得报酬日益增多，生活优裕，既会使其脱离群众，也易于使其满足已有的成绩，同样会妨碍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而且随着生产的愈益发展，两者的生活差别愈益扩大，必将影响内部团结。无疑这是按劳分

配原则本身的缺点和局限性带来的矛盾。所以，杨懋同志认为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消极因素，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要解决上述矛盾，只是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客观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无论在刺激生产上和反对资产阶级剥削思想上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即使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后，“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人企图在现阶段就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否认物质利益原则，主张在目前条件下，供给部分越多越好，甚至完全以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无疑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的表现。这样作，必然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产品的增长，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前进，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原则究竟将起怎样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地不断发展的过程。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将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的质变而发展、改变和衰亡，并随着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所代替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它的发展的必然规律。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比按需分配

的供給部分还将有更快的发展。这就是說，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則还有充分发展的必要。但它的这种充分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按劳分配的工資部分的充分发展并不排斥按需分配的供給部分的发展，更不是否定按需分配的供給部分的存在。只有这样辯証地来理解它，才是正确的。而且，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产品的进一步丰富，以及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变，一句話，随着向共产主

义社会前进，必然是逐步扩大和提高按需分配的供給部分的比例和标准，逐步縮小和降低按劳分配的工資部分的比例和标准。不这样，就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因此，这应该是一个必然趋势。杨樾同志认为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前进，按劳分配、物質利益原則将不是逐渐削弱而是繼續充分发展，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符合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馬克思主义观点。

广东省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教师学习班結束

为了适应人民教育事业大跃进的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教育厅举办教育学科教师学习会。其中心理学学习班是由全省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教师組成的，他們在去年九月初集中学习，历时十个月，于今年七月初胜利地完成学习任务。

在学习中，教师們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級心理学学术思想，明确了心理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必須面向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教师們經過参加人民公社运动的鍛炼，并經過多次的学术討論，对心理学上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如心理学的对象，心理学的科学性質和研究任务，以及心理学有沒有阶級性等問題进行了鳴放辯論，提高了認識。在此基础上，教师們分別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部队去，一边进行調查研究，收集了丰富的有关心理学問題的实际材料，写成調查研究报告十七篇，为編写心理学教学大綱和讲义作好了准备。

从今年五月开始，全体教师又回来集体进行編写心理学教学大綱和讲义的工作，經過两个多月的共同研究，写出了新的心理学讲义初稿，最近初稿修訂工作已經完成，现在正在进行排印中。

新的心理学讲义共十三万字，分为总論、教学心理、劳动心理、个性心理等四篇，共十章。讲义的内容克服了过去在教学上某些超政治、超阶級、脱离实际，把心理学生物学化的錯誤傾向，具有鮮明的阶級观点，重視阶級地位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作用。同时它打破了以心理过程为綱的旧体系，明确地以党的教育方針为綱，既重視給学生以系統基本理論知識，又強調联系教学实际，使心理学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李巨才)

短論与隨筆

“好得很”和“糟得很”

楊奎章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好得很”，一种是“糟得很”。这两种态度所以截然不同，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相对立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进步事业和革命斗争，都必然表现为一种革命的群众运动。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直接参加，任何雄谋伟略和崇高理想，都只是空中楼阁或纸上谈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最广大群众规模的革命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十分珍惜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重视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

和马克思主义者相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总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把群众看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充其量也只是“英雄”、“伟人”建立丰功伟绩的垫脚石。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英雄造时势，而不是时势产生英雄。

革命既然是千百万群众的轰轰烈烈的行动，就不可能象闺女绣花，一步不乱；也不可能要求它完全按照既定的方针、政策、策略，规行矩步、四平八稳地进行。马克思主义者在十分重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

的同时，对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偏差、错误和挫折，总是采取负责的、爱护的态度，就象一个母亲，虽然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疥疮，但决不因为孩子生了疥疮就不爱孩子一样。

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态度相反，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常常采取旁观挑剔，否定一切的不负责任态度。他们不是处身群众运动之中，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而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评头品足。他们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他们对群众的自觉行动总是不顺眼，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万一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偏差、缺点、错误和挫折，那就更振振有词了。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只要按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原则办事，就可以不发生任何缺点和错误；就可以使一切平安无事；他们说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关系是“自欺欺人”，要吗一切都好，要吗一切都坏。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否定一切态度的人，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实际上已把自己摆在和革命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

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之后，对这次运动的评价和看法，总会出现“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两种态度。在1958年的

大跃进之后，出现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潮，唱起“糟得很”的低调。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倒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这在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反映，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再一次进行挣扎的表现。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所取得的成就，真可以说是震古烁今。根据核实的数字，这一年我国钢的产量，把土钢除外也增加了几乎50%，粮食增长了35%，棉花增长了28%。粮食和棉花这一年增长的产量，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五年增长的总和。这在全世界又能找到多少先例？在旧中国就更难想象的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速实现，并且在初露头角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这些都多么生动地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活泼生机。全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所表现的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先人后己的崇高风格，藐视困难、征服困难的英雄气概，这些又多么生动地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民族的青春和活力。除了我们的敌人和准备带着资产阶级的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对于这些，难道还有什么怀疑的吗？但是，有些人硬是看不见这一切；他们老感到这也“糟了”，那也“糟了”。

我们说，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这是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件法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并为今后的继续跃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那是不难理解的。这些缺点，经过整顿巩固，很快已纠正过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面对着这样辉煌的成就，却闭着眼睛硬说什么“糟得很”。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封为比党和五亿多农民还要“革命”、还要“正确”的角色。

总之，凡是人民群众感到“好得很”

的，这些人都觉得“糟得很”。到底是什么“鬼”迷了心窍？拆开来，还不是一个“我”字。把“我”摆在“我们”之上，也就是说，使自己置身群众运动之外，或者身虽在群众之中而“心不在焉”。至于某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处散播悲观失望，往群众头上泼冷水，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罪过了。

有更多的人的右倾，还没有达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他们在一片“糟得很”的叫嚣声中，乱了脚跟，动摇了信心和继续前进的勇气。说到成绩总是怀疑，听到缺点容易相信。看不到工作中的有利条件，而常常夸大前进中的困难。对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认为做不到而不去做。他们害怕苦战，存在松劲情绪。这种人，在“好得很”和“糟得很”之间打转，弄得头昏脑胀，如果不坚决倒向“好得很”一边，也难免跌入“糟得很”的泥坑。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两种态度，实质上是赞成革命和反对革命的区别，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岭。只有当你觉得“好得很”，你才能满腔热情地、坚定不移地从事革命事业，不怕困难，不知疲倦，就是当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发生缺点和错误的时候，也不改变初衷，不悲观失望，而是始终和群众一道，朝气蓬勃，一往无前，在前进中去修正错误，战胜困难。相反地，如果你觉得“糟得很”，就必然会站在群众的对面，和党存有二心，觉得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止步不前。由此可见，治疗右倾顽症的唯一验方，就是到群众中去，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做到和群众一条心，和党一条心。同时，要努力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不被一些非本质、非主流的暂时现象所迷惑，所吓倒。

为新生事物鸣鑼开道

田牧

当一九二八年的秋天，革命紅旗插在井崗山上的时候，有人怀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然而毛泽东同志英明地洞察了中国社会經济政治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变化之后，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于一九三〇年春天預见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說“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帆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兒。”

从这个大家熟悉的历史事件中，我們悟见了一条真理：世界上，凡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意志的一切新生事物、新生力量，不管当它在出现时，显得多么弱小，但它总是要成长、发展起来的，你想摧残它也是摧残不了的。而一切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意愿的事物，不管它在暂时看来，还是那么强大，但終究要走向灭亡的。

苏維埃政权刚刚誕生的时刻，丘吉尔不是大叫要把她扼死在搖籃里嗎？然而，她成长起来，而且变成了巨人。原来想把她扼死的人，现在却在这巨人的面前发抖。当新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站立起来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也想摧毀她，扼杀她，但結果呢？她始終以英雄的姿态、豪迈的步伐，沿着胜利的道路，以奇迹般的速度，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一切仇視人类进步的反动分子不懂得这条真理，是不足为奇的。而一些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在这个問題上弄得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那才倒霉。因为对真正的革命党人来说，沿着馬克思主义这条真理的道路，

为新生事物新生力量鳴鑼开道，支持她們的成长，是本分的事。可是，那些自命为“革命者”的先生們，却打击他們、咒罵他們，不是“雪中送炭”，而是大泼冷水，其居心何在，那是一目了然的。还有另一种人，既不是坚决反对，也不是热烈支持，而是評头品足，冷言冷語。为什么同一事物，而不同的人对它却“各有春秋”？这里，当然有看問題的方法問題（从人民內部來說），但根本的問題却在于人們的立场、观点。

过去人們对于土地改革这个裹裹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想法，非常直接地反映了不同階級的人的不同物質利益要求。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有些同志犯錯誤，固然有方法問題，即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但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农、或者具有資本主义自发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較少的

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些情况不好說明这些人之所以犯錯誤，归根到底，还是个立场問題嗎？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在我国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浴泽下出现的新生事物，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結合的产物。然而，有人硬說它是少数人裹出来的，既违背天理、又不近人情；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有目共睹、不可辯駁的事实，而有人硬說这些只是紙上空談而已。……如此种种。右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为右傾机会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的原故。

当然，不能把对新生事物的看法上的错误，都归结为立场问题；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是由于人们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或不大对头所致，例如有些同志不了解或不大了解：新生事物成长的一般规律是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从不巩固到比较巩固，因而当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时，认识不清楚，而产生某些悲观情绪。但也有一些同志受到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就是属于阶级原因而产生的认识上的错误。

我看，我们决不能有天真的想法，以为现在阶级斗争之火已经熄灭了。事实上是，我们国家仍然处在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今天，虽然在经济战线上已基本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问题，但是当社会主义事业日进千里，农村中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和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国内外的反动派对这场革命既惊慌，又痛恨，而我们人民内部的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对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越来越巩固的领导地位还不心服，一有机会还想跟我们较量一下。当然，我们今天经过了整风、反右斗争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决不能认为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就完全解决了。“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比在经济上消灭剥削阶级还困难得多，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和教育过程才能解决；因此，今天两条道路的斗争又最大量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

这是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一般规

律。应该说，这些道理是许多人读得可以背出来的。但是一碰到实际便忘光了或大部忘却了。那种认为经过整风、反右，“天下太平了”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提醒我们还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人民公社，对大跃进，采取资产阶级老爷式态度或是轻浮的知识分子的讥讽态度，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和形式。在群众与干部中散布种种悲观主义论调，企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造成混乱，这正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党内、革命队伍内的反映。当然，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毕竟是少数，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在许多场合下，人们对新生事物的看法上的某些错误，是属于认识方法问题。但这种情况，不能说明我们可以忽视立场观点问题；正视立场问题，完全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去对待新生事物、新生力量。

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前一个时期学习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重大意义，而且，今后还要大谈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加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立场问题上取得共同语言后，更有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说：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粉碎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这就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当前的迫切的战斗任务。

八月二十八日深夜

乐观·信心·毅力

丘谷間

——“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

——用两年的时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基本指标！

这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充满着中国共产党人那种所向无前，战无不胜的革命乐观主义。

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路越走越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前途越来越光明。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必然要灭亡，凡是适合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一定要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是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这条真理的道路，确信在天空上，乌云总会消尽，太阳总会出来，而勇敢地奋斗着、持续着，终于在那旧中国荆棘丛生、狼虎当道的土地上，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国不过十年，我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在这里，对事业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充沛的革命干劲是万分宝贵的。事实上是：信心、勇气、毅力，乃是共产党人争得胜利的起码条件；唯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才能使我们在艰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坚持下来，去赢得更大的胜利。

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洞见胜利中蕴藏着困

难，所以头脑清醒，洞见失败中孕育着胜利，所以信心百倍；既面对现实，又预见未来。

解放初期，一方面我们争得了一个新中国，一方面我们在经济上又面临着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市场波动、物价上涨的种种困难。帝国主义反动派讥笑我们，诽谤我们，以为我们无法克服这些困难，而我们队伍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也发出悲观的论调。然而事实怎样呢？困难被克服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了。今年，我们广东遭遇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也幸灾乐祸，期望我们过不了这个“难关”。然而事实怎样呢？灾区人民战胜了洪水，生产恢复了，“被洪水夺走的一定拿回来”的誓言正在实现中，灾害的痕迹正在迅速消除中。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我国人民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然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新生事物的成长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困难。仇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内外敌对分子乘机污蔑攻击我们。然而事实怎样呢？这些局部性的暂时性的困难也被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敌人的鼓噪不休，从反面证实了我们的路是走对了，而使我们的信心日增地继续向前！

这一切都说明：对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来说，一切困难总是前进中的、可以克服的困难。敢于藐视困难，才能战胜困难。这种对前途满怀希望的革命英雄气概，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我们的党是彻底的革命的唯物主义的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1957.4.26人民日报社论）对于革命乐观主义者来说，即使节令有严寒酷暑、春

夏秋冬，然而思想却永远是常青之树。

在我们队伍中少数不坚定的人却不是这样。稍一风吹草动，他们就疑神疑鬼，见到“月亮升落要感伤，花开花谢要发愁，乌鸦迎头叫一声，也认为不吉利。”这显然是错误的。应该记住：当战士张惶失措的时候，他就不能算是战士！在革命的道路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难道不该及时警惕么？至于那些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的悲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则是

我们队伍中当前的主要危险。粉碎这种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我们迫不及待的政治任务。

乐观，发源于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信心，使我们产生了无穷的毅力，引导我们无畏地去征服任何困难；战胜了困难，自然信心倍增，勇往直前。这样，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就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悲观、消极、畏难，在我们的词典里，是永远不会有它们的“立足之地”的。

能动性 与 实事求是

何 白

既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要求办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们做任何一件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上半年的继续跃进，正是由于我们的广大干部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但是，现在一些有右倾思想的人，却拿“实事求是”来替他们的右倾思想作辩护，认为既要“实事求是”，就不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就把畏难而退、松劲泄气、“指标越低越好”、怀疑成绩夸大缺点等等说成“实事求是”。这是不对的。其实，实事求是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东西。实事求是，要求我们按客观的实际情况和可能条件去办事，但客观的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要使

可能变为现实，不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的。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去空谈“实事求是”，结果就会使人遇到困难时，悲观失望，无能为力。实事求是的“求”本身，就要求人们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中，求出“是”（真理）来。因此，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去空谈实事求是，其结果必然是右倾保守。当然，人们做事情，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超越客观可能性，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也不对。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我们的工作失败，同时，也不利于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这里，而是右倾思想抬头，障碍我们的事业的前进；不是信心和干劲过了头，脱离客观实际的问题，而是信心和干劲不足，主观落后于客观，赶不上新形势的发展的问题。因此，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批判那些实际存在的右倾思想，就非常必要了。

右倾思想的基本特点，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就在于它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

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见“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任何时候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因为一切社会财富都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创造出来。“事在人为”只要人们肯于努力去干，就算是客观条件较差，困难较多，也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变困难为顺利，做出一番成绩来。

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充分发挥人的干劲、智慧、潜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要想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从来十分珍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就体现了这个精神。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在几年的时间内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胜利，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了人民群

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结果。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的发表，对于调动我国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干劲冲天，斗志昂扬，因而使我国能够实现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上半年的继续跃进。这些都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就说明了，那种认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任何时候都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知难而进，不要畏难而退。要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不要泄了自己的气，又去泄群众的气。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争取更大的胜利。

民族研究

月 刊

为紀念創刊一周年征求訂戶啟事

“民族研究”月刊，是在党的领导下对我国民族問題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理論性、学术性的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闡述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宣传和闡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解决我国民族問題方面对于馬列主义民族問題理論的創造性的发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获得的伟大成就，研究当前民族工作中存在的现实問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关系，批判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和資产階級民族学、历史学等学术思想等等。

茲值“民族研究”月刊創刊一周年之际，特向全国各地，特别是民族地区，广泛征求本刊訂戶。凡愿意閱讀“民族研究”的同志，請向当地邮局办理訂閱手續，全年十二期，定价2.40元，半年六期，定价1.20元，一季三期，定价0.60元。

理論与实践

月 刊

1959年第9期(总第21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9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46-71

刊号：(國)0368

印数：4

定价：每册二角